

臺灣史研究·第八卷第二期

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
——《認識臺灣》教科書
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民國九十年十二月

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

——《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 內容與脈絡分析*

王甫昌**

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透過分析一九九七年間《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中，爭議內容與發生的社會脈絡，探討臺灣目前民族想像與族群意識之間的糾葛關係。本文指出，《認識臺灣》的爭議，主要的意義在於不同史觀的提出及爭奪進入代表國家歷史詮釋立場的教科書中；而這樣的爭議必須放置到「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之間長期對抗脈絡中，才能夠理解其發生時機及具體爭議內容。本文解釋了爭議風波中三個主要歷史內容爭議點（「反中」、「親日」、「反李登輝」），是如何在長期民族想像對抗中被拉在一起，以及為何在一九九〇年代族群政治競爭脈絡中出現。這兩種不同民族想像目前主要爭議，在於對臺灣「未來」走向（統獨立場）與對「過去」（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及日本統治的定位）之詮釋。對於未來的期望影響到對於過去的選擇與呈現，使得複雜的歷史被壓縮為簡單的符號及立場，使得這樣的爭議難以解決。更重要的是，臺灣民族想像族群基礎，使得這些歷史詮釋爭議，回過頭來重塑及增強了族群分類意識。就族群的意涵來說，一般民眾參與這些爭議的文化心理基礎是，擔心自己族群的文化與集體記憶不被尊重或甚至被抹消，也就是擔心自己族群的滅絕。

關鍵詞：臺灣意識、中國意識、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民族想像、族群意識

* 本文使用分析資料蒙國立編譯館編審楊國揚先生、南天圖書公司提供；張毓芬、陳永宜、傅叔芝、王維邦協助蒐集整理資料；柯志明、蕭阿勤，以及《臺灣史研究》兩位匿名評審對初稿提出寶貴修改建議，在此一並致謝。文中資料、觀點當然都由作者負責。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 一、前言
 - 二、《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始末
 - 三、爭議內容組成——四家報紙媒體事件分析
 - 四、過去臺灣教科書大中國史觀內涵及其形成背景
 - 五、爲何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才出現對於「大中國史觀」的挑戰？
 - 六、《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脈絡分析
 - 七、討論與結論
-

一、前言

一九九七年六、七月間，臺灣發生了一件引起整個社會注意的爭議事件。當時仍屬新黨籍的立法委員李慶華在六月三日舉辦了一場「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是否妥當？」公聽會，針對即將於該年九月採用的新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歷史篇》與《社會篇》部分內容，提出了措詞強烈的質疑，因而揭開了一連串爭議活動序幕（李慶華隨後所發表的聲明及質疑內容請參見附錄一）。經過媒體報導，除了負責編寫教材的編審委員會及撰稿人出面回應之外，建國黨及民進黨的民選公職人員與支持群眾，也紛紛出來表示支持這份新國中教科書。這一連串事件，被媒體稱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根據作者統計，在往後三個月之中，參與爭議的行動者至少舉辦了八場公聽會，發動四場群眾抗爭活動；而臺灣四家主要日報中，則一共出現了 341 則有關這個爭議風波的新聞報導、評論，或讀者投書，⁽¹⁾ 其中還包括三次頭版頭條新聞報導。⁽²⁾ 這是臺灣社會中首次針

(1) 這四家報紙是《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及《民眾日報》。另外，根據杜正勝（可能根據不同類報紙）統計，「新聞報導超過二百五十則，社論十八篇，專欄一百篇，……讀者投書也將近兩百篇。」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歷史教科書風波的分析〉，收於杜正勝，《臺灣心·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頁 158。

(2) 《民眾日報》，1997 年 6 月 24 日、7 月 13 日，及 7 月 21 日頭版頭條新聞。

對教科書內容，引起普遍爭議與討論。

然而，在兩個編審委員會分別通過修正結果，發生了群眾抗議事件，以及民進黨與新黨代表舉行電視辯論之後，這個本來被預期會越演越烈的爭議風波，似乎就漸漸平息了。雖然反對者對於修正內容仍然不滿，李慶華赴教育部抗議時，也表示：「如果教育部執意於九月啓用《認識臺灣》教材，那將會出現大亂子」，⁽³⁾許多情緒激動的抗議者甚至向媒體揚言要火燒國立編譯館，但是抗議者似乎沒有其他後續行動。這次爭議風波中，由於議題敏感，激起了很多人強烈情緒，也引發了嚴重對立。雖然這個爭議風波最後它在不到兩個月之內相當平和的落幕，但是它所引發的討論，卻餘波盪漾。這或許是因為李慶華等人質疑《認識臺灣》教科書在編寫內容與文字上所顯示的意識形態，似乎涉及臺灣觀點與中國觀點的爭論，使得它和國家認同爭議糾結在一起。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釐清《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所突顯的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記憶之關聯。就此一目的來說，這個爭議事件的分析價值，在於它突顯了歷史記憶與民族想像的關係。這個爭議事件發生背景以及其具體爭議內容，代表了臺灣兩種對立的「民族想像」(national imagination)——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之間，在經歷了長期對抗與發展之後，在一九九〇年代的一個重要轉折。如果要解釋這個爭議事件，則其發生時機與爭議內容到底是什麼，便成為重要研究議題。具體的說，對於這個爭議事件，本文希望回答下列兩個問題：(一)為何關於歷史教科書的爭議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發生？造成這種衝突的社會條件是什麼？(二)為何爭議內容除了包括檢討臺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之外，也包括了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的爭論？本文將採用內容分析確立「內容爭議」(到底在爭論什麼)；而以脈絡分析解釋爭議發生時機的「社會脈絡」——包括是誰、為何在此時發起爭議，以及它是在何種政治社會背景與情境下發生。本文將試圖說明具體爭議內容，特別是對於歷史記憶的選擇，是如何受到爭議發生的社會脈絡之影響。

透過這個爭議事件的內容與脈絡分析，本文企圖在理論層次上探討：為何民

(3) 參見《中時晚報》，1997年7月11日，第4版，「反《認識臺灣》，李慶華率眾抗議，赴教育部丟數箱雞蛋，強調9月會出大亂子」的相關報導。

族想像爭議會扯上歷史詮釋爭議？以及，為何關於歷史的爭議卻又和族群的議題糾纏不清？本文將在討論的部分試圖釐清這兩種糾結發生的背景原因，及其社會意涵。讓我們先看看此一爭議事件發生始末。

二、《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始末

本文一開始提到新黨立委李慶華對於《認識臺灣》教科書的質疑，可以說是此一爭議風波引起普遍注意的開端。雖然教育部早在一九九三年六月間就已經對外宣示決定將以《認識臺灣》的新科目(分為《歷史篇》、《地理篇》，及《社會篇》)，來取代原有國中一年級歷史、地理，及公民科目，當年九月成立了課程標準研定小組，一九九四年十月公佈教科書課程標準，一九九五年開始進行教科書研發與編審工作，⁽⁴⁾ 編撰期間也發生內部爭論；⁽⁵⁾ 但是，真正引起軒然大波的爭議，卻是發生在一九九七年六月，教材即將公佈採用之前。李慶華表示因為國立編譯館工作人員及國中老師提醒，他才注意到這一套新教科書內容「大有問題」(見附錄一)，決定邀集學者召開公聽會，設法阻止該教科書如期發行與使用。這個舉動引發了各方一連串反應。

李慶華等反對者透過公聽會指出，《認識臺灣》教科書《社會篇》及《歷史篇》當中有相當內容涉及「親日」、「反華」、「吹捧當權者」、「企圖割斷中國和臺灣的臍帶」，⁽⁶⁾ 要求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對編審委員會施壓，進行修改，否則就應暫停使用這套教科書並重編。這樣的指控與要求，引起建國黨及民進黨也出來表示支持這套教科書以臺灣為主體的編寫方式，並反過來指責李慶華等反對者，不願意讓孩童認識臺灣。反對者除了舉行公聽會之外，也在六月二十一日率眾前往國立編譯館，以丟雞蛋、破壞館內設施，及威脅將火燒該館的方式抗議。在這樣的壓力下，《歷史篇》及《社會篇》的編審委員會分別在六月二十四日及七月三日如期

(4) 參見黃秀政，〈國民中學「認識臺灣」(歷史篇)科的課程研訂與教材編寫〉，《國立編譯館通訊》9:2 (1996)，頁11-16。

(5) 參見呂實強，〈國中新課程「認識臺灣」(歷史篇)科設立的經過與教材教學有關的幾項問題〉，《國立編譯館通訊》9:2 (1996)，頁17-24。

(6) 這是李慶華對於《認識臺灣》教科書的主要質疑。見《中國時報》，1997年6月5日，4版。

表一 《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大事紀

日期	事 件
6/03	新黨立委李慶華邀請學者舉行「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是否妥當」公聽會。
6/04	教育部長吳京指示國立編譯館將教科書編印工作延後一個月。
6/05	吳京與李慶華會談之後，建議編審委員可再做檢討，包括使用較正面的文字。
6/07	建國黨、臺教會召開「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記者會回應李慶華批評。 民進黨國代十人至教育部表達支持教科書的立場。
6/12	建國黨舉辦「認識臺灣教科書公聽會」，肯定教科書內容。
6/14	李慶華召開記者會提出二十個問題，抨擊《認識臺灣》教科書。
6/21	新黨國代林忠山、臺北縣議員金介壽帶領三十餘人蛋洗國立編譯館。 新黨舉辦「學界主張重編認識臺灣教科書」記者會。 李慶華、許歷農及新同盟會舉行「反對違憲竄改教科書」活動。
6/23	臺教會及民進黨立委發起「別掐住臺灣孩子呼吸臺灣權利」連署活動。 國立編譯館表示屢遭恐嚇電話、信函騷擾，故決定編審會議不對外公開。
6/24	《認識臺灣》《歷史篇》召開編審會議，會後黃秀政、趙麗雲說明修改結果。
6/25	民進黨十五位國代對《認識臺灣》的更動發表抗議聲明。 趙麗雲表示將在教科書編審工作結束後辭去館長一職，吳京表示慰留。
6/26	中華民國愛國同心會至國立編譯館前鳴放鞭炮，祝賀趙麗雲「終於決定請辭」。 建國黨一百多名成員至教育部就教科書內容提出抗議，並在教育部門口撕毀教科書。
7/03	《認識臺灣》《社會篇》召開編審會議，會後杜正勝、趙麗雲說明修改結果。
7/04	李慶華等人召開「我們對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的看法」公聽會。
7/11	李慶華等人與新同盟會組成「全國各界反對違憲竄改教科書聯盟」，率領百餘人至教育部丟雞蛋抗議，要求重編教科書。
7/12	李慶華、新同盟會、中國統一聯盟至教育部丟雞蛋，要求吳京收回付印教科書的成命。
7/14	建國黨率領百餘人至教育部獻花支持《認識臺灣》教科書。
7/21	TVBS 電視臺、新新聞週報主辦「認識臺灣教科書大辯論」。新黨、民進黨派員參與。
7/26	杜正勝應邀舉行「一個新史觀的誕生——從《認識臺灣》的風波談起」演講，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抗議教科書以「蕃」稱呼原住民，造成兩派聽眾相互攻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召開最後一次編審會議，討論修正部份用語與說法，並隨即召開記者會公佈修正結果。反對者由於不滿編審會議修正結果，乃再度召開公聽會，並動員群眾去教育部丟雞蛋抗議，要求重編教科書。七月二十一日，民進黨邀請新黨派代表就《認識臺灣》教科書舉行電視辯論會之後，爭議風波乃漸漸平息下來。關於這些事件可以參考表一大事記所列。

除了群眾抗議行動之外，參與爭議各方也不斷透過媒體表示意見。根據表一整理的資料，參與爭議行動者至少舉辦了八場公聽會、發動四場群眾活動。而平面媒體更提供了大量篇幅，接受民眾投書。因此，除了向負責編纂教科書的政府單位表達抗議或支持之外，這個爭議事件主要戰場，是在平面大眾傳播媒體之中。事實上，由於這個爭議風波並沒有真的引發暴力衝突事件，此一風波中最激烈爭議，發生在媒體中不同陣營之間的文字攻擊。這些媒體上的報導和討論，一方面展現了爭議主要內容；另一方面也影響到一般民眾對於此一事件的認知與理解。因此，如果我們要了解爭議內容，除了參考參與爭議者所提供的相關文獻以外，這些媒體報導、專欄、投書內容，便成為重要來源。以下將分析這些平面媒體上所顯現的爭議內容。

三、爭議內容組成——四家報紙媒體事件分析

以下分析資料，是以臺灣四家主要報紙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到八月之間，所有關於《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的報導、專欄、社論、投書（共 341 則「媒體事件」），作為基礎登錄而成。為了便於分析爭議內容組成，作者將每一則報導、專欄或投書中，提到的各種實質議題，進行「是否提及」的登錄；也就是該則報導事件中是否提到該項議題，而不考慮它在該則新聞事件中出現了幾次。⁽⁷⁾ 由於本次爭議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國中教科書對於臺灣的過去與當前狀況的描述，因此，在經

(7) 這樣的登錄方式是考量到作者認為不同「爭議主題」的重要性，主要是表現它們在多少新聞事件中被討論的次數，而非在單一新聞事件中被討論的次數。在一個座談會報導中，同一個爭議實質主題可能會被不同參與者一再的提到，這在我們的登錄方式中，仍然只算在該則新聞事件中被提到。作者假設，爭議主題被越多的媒體事件提到，讀者越可能覺得它重要。

過初步的觀察及整理之後，作者決定將爭議主題區分為兩大類進行登錄：⁽⁸⁾ (一)臺灣的過去是什麼？(二)臺灣的現在是什麼？在這兩大類主題之下，作者另外區分了一些比較具體的主題。關於這些爭論主題之具體內涵，請參見附錄二。爲了要了解這些媒體事件所呈現的主要爭議點，我們將這些主題在多少則事件報導、專欄、以及讀者投書中出現次數，加以累加計算，其結果列在表二。

表二 《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事件新聞報導所顯示的爭議內容
與李慶華的 32 點質疑內容

爭議主題	出現的則數				佔總數 %	李慶華
	支持	反對	編纂	小計		
一、臺灣的過去						
臺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	141	43	22	206	60.4	8
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	58	48	23	129	37.8	5
對兩蔣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	38	10	2	50	14.7	1
歷史事件的選擇與遺忘	36	25	13	74	21.7	3
對於不同族群歷史記憶的相互尊重	27	31	7	65	19.1	0
二、臺灣的現在						
對現狀的描述：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7
臺灣地理範圍的界定	12	7	2	21	6.2	0
臺灣內部族群的分類	19	15	4	38	11.1	1
對現實政治人物的評價	28	46	20	94	27.6	5
報導或事件總則數	185	77	79	341		32

說明：爭議主題中的具體內容，請參見附件二；李慶華的 32 點質疑內容的細節，請參見附件一。

根據表二，爭議中最常出現的討論主題，前五名依次是「臺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在 341 則媒體事件中有 169 則提到，佔 49.6%），其次是「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129 則，37.8%）、「對於歷史事件的選擇與遺忘」（82 則，24.0%）、

(8) 除了對於臺灣的過去與現在的詮釋與定位之外，最常被提到的爭議主題是關於「政治不應干涉學術（教科書內容）」、「應該不應該有官方版教科書」，以及一些出版程序問題。由於這些爭議與本文主題無關，本文不列出它們登錄的結果。

「對現狀的描述：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71則，佔20.8%)、「對於不同族群歷史記憶的相互尊重」(66則，19.4%)。雖然另外有許多主題都在爭議中出現，例如，對於現實政治人物及兩蔣統治時期評價、四大族群區分是否恰當、臺灣的地理範圍等；但是就出現頻率來說，它們在媒體報導事件上所引起的討論與注意，卻不及上述這五項主題。

不過，支持(教科書)者和反對者之間在上述爭議主題中，各有不同的強調重點；爲了突顯各方強調的主題差異，本文將上述這些媒體報導或事件，根據其主要行動者是否支持《認識臺灣》教科書的立場，⁽⁹⁾分爲支持者(民進黨、建國黨及其支持者)、反對者(新黨、親新黨學者及其支持者)，及編纂者(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及編審委員會)三類，比較其差異。結果也列在表二中。表二的資料顯示，反對者發動的媒體事件有77件(22.6%)，而支持者發動的則有185件(54.3%)，負責編纂者所發動的有79件(23.2%)。

如果由爭議內容來看，則可以發現反對者對新教科書的質疑主要有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對於歷史的詮釋」，特別是關於如何定位日本統治(有62.3%事件提到)，以及臺灣與中國的關係(51.9%)；這主要是由一些研究臺灣歷史學者所提出。第二部份則是「對於當代政治事件及人物歷史評價」，特別是對於特定近代歷史事件(36.4%)及對於李登輝的定位(31.2%)；這主要是由政治人物(李慶華)提出。

總括來說，反對歷史學者認爲，新教科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過度肯定，並極力淡化日人統治對臺灣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壓低臺灣人民被屠殺的數字、淡化殖民政府對於臺灣民眾歧視措施、不提戰爭期間慰安婦等)，可以說對日本殖民統治者「歌功頌德」。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定位，顯然是反對者最在意的議題。另外，教科書故意不提臺灣歷史上和中國有關的一些重大事件(例如，中國在三國、隋朝、宋朝、元朝、明朝都曾派兵前來臺灣的史實)，也刻意不提一些外省人認爲較重要的歷史事件或人物(如八二三炮戰、白色恐怖、雷震案、新黨成立、嚴家淦總統等)，並且貶抑兩蔣政權、誇大前總統李登輝對於臺灣民主化的貢獻。

(9) 所謂的主要行動者，是指媒體報導當中的事件(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或抗議者)發動者，或者是撰寫專欄、讀者投書者。

除了對於歷史事實選擇與詮釋的抗議之外，部分反對者也指出，這些書寫方式背後有一套清楚的政治目的。例如，李慶華就認為，這些「竄改歷史」，或「遺忘歷史」的目的，可以說在為「臺灣獨立」鋪路。他也列舉了一些書中鼓吹臺獨的證據，包括教科書中稱臺灣（臺澎金馬）已經構成一個有主權及治權「國度」的遣詞用字，或是對不同歷史時期的稱呼方式。⁽¹⁰⁾

因此，雖然《認識臺灣》教科書中並沒有出現明白主張或宣揚臺灣獨立的文字，但是李慶華認為由於編撰者在書寫文字選擇上、對於臺灣歷史，以及臺灣和中國的關係所採取之史觀立場，和過去鼓吹臺獨者（例如，《臺灣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十分相近，而且字裡行間將臺灣視為一個「國家」，因此是「充滿臺獨意識」、是「顛覆大中華的觀點」。簡而言之，反對者所要描繪的圖像是：李登輝接受了臺獨史觀，而且在幕後操縱這一套教科書的撰寫；或者是撰寫者刻意在迎合李登輝的臺獨意圖。⁽¹¹⁾

不過，如果比較李慶華最初提出的 32 點質疑（表二最右邊一行），和後來媒體事件所顯現的反對者強調爭議內容，則可以發現二者之間最大差異，在於反對者一般討論中，並沒有大力呼應李慶華對於教科書中將臺灣視為一個國家的質疑。關於這個差異的意義，本文將在討論中進一步探究。

相對來說，支持《認識臺灣》教科書者，在爭議風波中強調的內容就有所不同。他們所關切的，大多和應該如何定位臺灣歷史中「統治者」具體事實有關。根據表二，支持者在媒體事件中討論最多的，是關於「臺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出現在 62.2% 的支持者媒體事件中），其次是「臺灣和日本的歷史關係」（31.4%）、「對現狀的描述：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25.9%）、「對歷史事件的選擇與遺忘」（21.6%）、「兩蔣政權／國民黨統治的評價」（20.5%）。由支持者所發動的媒體事件中，有將近三分之二都論及「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其出現次數也超

(10)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媒體報導對於李慶華質疑的定位。《中國時報》記者蔡碧珠在 6 月 5 日第 4 版報導中，整理出李慶華對《認識臺灣》教科書兩個質疑要點，一個是「擁李篇」，一個是「臺獨篇」。其中「臺獨篇」所列舉的主要證據，就是：(一)將臺澎金馬稱為「臺灣社會」；(二)全書中沒有提到「中國人」、「中華民族」；(三)直接採用「臺獨先驅」史明的說法，認定臺灣的歷史只有四百年；(四)稱「新臺灣……國度」；(五)以「第二次大戰後」替代「光復後」、「中華民國」；(六)提出：「為了維持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的主權與治權」的說法。

(11) 李慶華因此才說：這套教科書「根本就是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所合編的，要不然就是主張臺獨的學者，在貫徹李登輝意旨……」；見《中國時報》，6 月 5 日，4 版，頭條新聞報導。

過其他主題出現頻率一倍以上，可以說是他們最關心的主題。而針對此一主題，他們的討論大多集中在闡述「臺灣自古不隸屬中國」、「中國只是臺灣歷史上諸多外來政權之一」，以及「近代臺灣和中國的發展是各自平行、而非從屬」的歷史論點上。這可以說是對於過去教科書中中國意識的反擊（見下文討論）。另外，支持者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討論，則是強調日本對於臺灣各種文化及社會建設，以及為臺灣帶入現代化國家法治觀念等等正面影響。支持者也相當在意「臺灣現在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許多人強調應該要正式地使用臺灣的名稱來取代中國，突顯臺灣是一個政治實體的事實。至於兩蔣統治臺灣時期，他們則一反過去教科書只有正面描繪的做法，開始採用比較負面的方式來描述。

不過，和反對者相比，支持者基本上並沒有針對新教科書內容進行評論，而是藉著闡述對於臺灣與中國及日本的關係之新歷史觀點，以及對於臺灣現狀的界定，去反制反對者對於新教科書的批評。事實上，支持者（特別是建國黨支持者）也認為教科書內容沒有完全站在臺灣主體立場書寫歷史，表示不滿意。他們所以站出來，但是沒有批評或討論教科書的詳細內容，主要是因為認為新教科書代表一個值得鼓勵的新方向，而反對反對者的阻撓。

由以上爭議內容討論可以知道，《認識臺灣》教科書主要的爭議點在於它代表了官方歷史觀點的一個巨大轉變。誠如爭議風波一開始時，新聞媒體在第一次報導這個事件時，以「《認識臺灣》教科書顛覆大中國意識」⁽¹²⁾的標題為爭議所下的定位，新教科書代表著一種看待臺灣過去的新觀點。而其具體的爭議內容，則主要包括下列四點：一是對於「臺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二是「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三是「臺獨」，四是「李登輝之功過」。前二者是歷史學者關切的史實與史觀，後二者是政治人物關心的現實政治導向。在討論這四個爭議的主題是如何連接在一起之前，讓我們接著看看此一歷史觀點轉變的內涵與背景。

四、過去臺灣教科書大中國史觀內涵及其形成背景

一九四五年臺灣歸還中國以後，各級學校歷史教科書中是以「大中國觀點」

(12) 《中時晚報》，1997年6月5日。

史觀呈現臺灣歷史。它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在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上，將臺灣視為中國「固有領土」一部份；二是對於臺灣歷史以「中國中心」角度來加以審視。⁽¹³⁾ 這兩個基本立場決定了教科書中如何定位臺灣歷史中的不同時期和中國的關連，以及不同的統治者。

具體的說，所謂的「固有領土」說法，是認為臺灣自古（至少是東晉）以來，在政治歸屬上即屬於中國一部份。然而，根據近人研究與考證，這事實上是二次大戰末期才出現的觀點。就歷史記載來看，儘管中國歷史文獻中漢人對臺灣的開發與經營之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國時代，不過，曹永和認為：「自三國時代起至明末之間，有孫吳的討伐夷州，隋煬帝的經略流求和元代的招諭瑠求等，但是這三個時期之政府的武力經營，均無任何成就。……至晚明始有國人積極的移植」。⁽¹⁴⁾ 早期漢人對臺灣的開發與經營，在當時是否被認為是納入版圖之舉，不無疑問。元朝曾在澎湖（而非臺灣）設置巡檢司，但是明初朝廷又予以放棄。而清朝的史學家趙翼認為：「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或《皇清職貢圖》卷三所說的：「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本朝始入版圖」，⁽¹⁵⁾ 更說明了「固有領土」說在清朝時仍無共識。

雖然清朝統治臺灣 211 年，臺灣居民中也有相當比例是中國南方各省移民後裔，但是自從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到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以前，國民政府（甚至中國共產黨）並不認為臺灣是中國「政治版圖」一部份。⁽¹⁶⁾ 有些人甚至認為臺灣人民已經構成和中華民族不同的民族，鼓勵臺灣獨立。自從一八九五年之後，中國對於臺灣的主權宣稱，最早是在一九四二年。⁽¹⁷⁾ 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五五憲草」時，某些當時被日本佔領的淪陷區（例

(13) 臺灣歷史學會，〈「建立臺灣主體性歷史觀」座談會〉，《臺灣歷史學會通訊》1（1995），頁 3-37。

(14)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北文獻》3（1963），頁 1。

(15) 見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頁 176；見趙翼〈平定臺灣述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秩）；《皇清職貢圖》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頁 24）。杜正勝的文章中另外也將宋、元、明、清四朝的歷史記載中對於這個觀點的佐證文字整理列出（頁 176-185）。其主要的論點有二：（一）宋朝以後歷代正史對臺灣才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二）清人認為臺灣自古不隸中國。

(16) 這主要是指「政治版圖」或政治認同，而非文化認同。在日本統治下，不少臺民仍自認為「中國人」或「漢人」。

(17) Frank T. S. Hsiao (蕭聖鐵),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43," *Pacific Affairs* 52:3 (1979), pp. 446-467.

如，東北) 也被列入中華民國版圖中，但是臺灣並沒有被列入。⁽¹⁸⁾ 這說明了：將臺灣視為中國領土一部份的看法，在之前並非共識。然而，在二次大戰後期，盟軍決定將臺灣交給中國之後，國民政府開始強調「臺灣自古隸屬中國」的說法。在此一史觀下，臺灣和中國有相當長遠而延續的關係，雖然中間因為外族佔領有一些中斷。

至於「中國中心」，則是指以中國的角度，去看待臺灣歷史上不同時期統治者的定位；因此中國（包括明鄭、清朝，及國民政府）被認為是臺灣的開發者與建設者，而西班牙、荷蘭、及日本則被認為是侵略者與掠奪者。⁽¹⁹⁾ 在這種史觀定位下，一九四九年以後進入臺灣的中國政權與移民，對於日本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化痕跡與建設，比較無法容忍或持平對待。這主要是因為在近代史上，中國與日本之間，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二次大戰期間，一直處於敵對狀態。相反的，臺灣卻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受到日本文化影響，並開始現代化歷程。因此，兩地人民的日本經驗本來就有很大差異；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這種差異更成為臺灣人民與大陸移民之間，區分彼此的重要標記。

不過，必須強調，戰後初期臺灣人與大陸人衝突，並不是差異性文化接觸必然結果；接觸初期其他社會與政治條件，才是導致衝突的主要因素。二次大戰以後，臺灣民眾熱切地希望回到祖國懷抱，而來自中國大陸各省人士，初期對於臺灣當時的建設與文明進步也相當讚揚。⁽²⁰⁾ 但是當國民政府的代表真正開始統治之後，雙方這些熱切與善意，卻因為戰後經濟衰敗、雙方在政治文化與政治期望上的落差，以及行政長官公署一開始就敵視臺灣人民日化，極力想將臺灣「去日本化」等種種因素匯集，很快的轉變為對彼此的鄙視。臺灣「本省人」開始公開

(18) Christopher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5-16.

(19) 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收於《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集》（臺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頁115-138；吳密察，〈社會科——歷史〉，收於吳密察、江文瑜主編，《體檢國小教科書》（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91-142。

(20) 李筱峰，〈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史聯雜誌》19（1991），頁105-119；李筱峰，〈解讀二二八〉（臺北：玉山社，1998）；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史聯雜誌》19（1991），頁89-103。黃俊傑，〈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收於夏潮基金會主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廈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頁16-22。

在新聞媒體上批評行政長官公署所帶來的貪污腐敗、以及排擠本省人。而部份「外省官員」在受到「本省人」公開「羞辱」之後，也開始仇視臺灣民眾的「日化」（以「奴化」稱之）。他們認為必須以強力手段「去日本化」，才能讓臺灣人民誠心接受祖國。當時採取的「去日本化」文化政策，包括：將大多數具有「日本風味」地名改為具有中國色彩的地名；在光復一週年時，就全面禁止使用日文及日語；禁止穿日式（「二齒式」）木屐；將日本神社改為「民眾教育所」等。⁽²¹⁾ 之後，由於「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及許多臺灣民眾在事件中回復使用日文的表現，⁽²²⁾ 更使得國民政府深信臺灣民眾深受日本統治毒化影響，⁽²³⁾ 必須更加貫徹「去日本化」政策。國民政府內戰失利遷臺以後，文化政策上也延續此一精神。

在上述大中國意識史觀影響下，長期以來，臺灣教科書中關於臺灣以及臺灣歷史之內容，不但所佔篇幅極少，而且內容選擇相當具有政治性。在篇幅太少方面，過去國小教科書當中關於臺灣的部份所佔篇幅，比例不及3%。龍應台就曾經指出：「……中小學社會課本一共有十二冊，每冊平均一百頁，總共是一千兩百頁左右，【……】。真正專注於講解『臺灣』的，【……】只有三十多頁！」。⁽²⁴⁾ 另外，劉曉芬（1991）也指出，臺灣史在國中及高中教材中，所佔份量都不到本國史的百分之五。至於內容選擇性方面，根據劍南（筆名）歸納，教科書中臺灣史內容在課目及重點上有幾項一貫特徵：

1. 在臺灣早期的歷史上以「臺灣與大陸」為主題，強調「一體性」及「同源說」，而以「夷州」、「琉球」及「臺灣」等古史記載說明之。
2. 對於荷據史實的忽略，僅在國小社會科中提及荷人暴政及「愛國志士」郭懷一抗暴的事件。
3. 對於明鄭時期則強調鄭成功抗清、驅荷開臺的民族意義，

(21)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李筱峰，〈解讀二二八〉；楊聰榮，〈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臺灣的中國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22)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許多臺灣民眾開始回復使用日語，甚至在街頭唱日本軍歌、以日語盤問路人、「日語廣播、日文戰報充斥」（參見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這些原本只是為了要區辨本省人與外省人、或抗議貶抑日文政策的不當之做法，讓許多外省人覺得臺灣似乎又成為另一個（日本）世界。

(23) 由於註22提到的狀況，不論是當時臺灣行政長官陳儀、事件後奉命到臺灣來視察的國防部長白崇禧，或者是閩臺監察使楊亮功，都一致認為「臺灣民眾的日本（奴）化」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

(24) 龍應台，〈野火集外集〉（臺北：圓神出版社，1987），頁44。

國小教科書並以之與先總統蔣公並列為『光復臺灣的兩位偉人』。4.對於清領時期以沈葆楨、劉銘傳的建設事業及臺灣割讓後臺胞的抗日為重點。5.對於日據時期史實的忽略，而以臺胞抗日為唯一重點，並以羅福星及連橫為主要人名。6.對於臺灣光復後的歷史則以「復興基地的建設成就」為唯一內容，時間上以民國卅九年一月蔣總統復行視事為起點。至於民國卅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光復以後的史實則完全闕如，僅幼獅版中提及陳誠實行三七五減租等治績云云。(25)

反之，中國歷史與地理在教科書中佔極大篇幅。這些篇幅及內容安排的目的，是希望強化臺灣民眾對於「祖國」認同、(26) 接受臺灣為「反共的復興基地」，(27) 以及淡化日本殖民統治的不良影響。

上述「大中國史觀」看待臺灣歷史的方式，是以中國大陸移入的第一代外省人(28) 之集體記憶做為發展基礎。這可以由外省籍歷史學者郭廷以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臺灣史事概說》一書內容見其一斑。(29) 大中國史觀是戰後初期中國意識主導下民族想像之一環。當時中國意識的民族想像認為，臺灣人民在血緣及文化上是中華民族後裔，臺灣自古是中國領土一部份；不過，由於臺灣在近代受了外族殖民統治不良文化影響，因此需要一番去日本化及再中國化過程，才會認同祖國。若以當前臺灣意識者史觀立場回溯來看，教科書上對於日本統治的選擇性描述或忽略，可以說是對於第一代本省人(30) 集體經驗（特別是日本記憶）之否定與壓抑。但是，大中國史觀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幾乎沒有在臺灣社會中受到有組織的公

(25) 劍南，〈官方說法的迷思——從部定歷史教科書談臺灣史意識〉，《南方》6（1987年4月），頁9-10。

(26) 石計生等，《意識形態與臺灣教科書》（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

(27) 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吳密察，〈社會科——歷史〉。

(28) 這裡所謂的「第一代外省人」，是指在中國大陸成長到十歲以後，才在1945年以後來到臺灣的大陸各省人士，包括二二八事件時就已經在臺灣者。稱他們為第一代外省人，是因為臺灣社會中「本省」／「外省」區分，是1945年接觸以後才出現的人群分類。

(29) 關於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重排版，1996）一書的代表性，歐素瑛指出，該書在1954年發行初版，至1996年重排本出版為止，前後印行八版。除了連橫的《臺灣通史》外，這是臺灣史相關書籍中無人能及的紀錄。該書也為早期臺灣史研究莫立思想基礎，影響後來的研究方向。歐素瑛，〈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與實踐——以《臺灣史事概說》一書為例〉，《臺北文獻》，頁134（2000），頁61-62。

(30) 這裡所謂的「第一代本省人」是以1945年臺灣「光復」（或「歸還中國」）為時間界線，在此之前即在臺灣成長到十歲以上者屬之。他們共同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關於日本統治部份，與之後的本省人截然不同。

開挑戰；反對聲音要到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才出現。

五、為何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才出現 對於「大中國史觀」的挑戰？

以下將討論為何臺灣意識對於大中國意識與史觀的挑戰，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出現，而後說明這種意識出現的社會脈絡及其過程，對挑戰內容之影響。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關於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研究，因為與現實社會與政治情勢之關聯性，而成爲熱門課題。不同研究者對於這些現象探討各有著重，對於「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現象定義更是五花八門。⁽³¹⁾爲了界定本文討論現象，這裡必須先說明一下本文所稱「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之特性。

本文所稱的「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是指戰後在臺灣社會中所發展出來、具有現代社會中民族想像意涵，及對抗性作用的兩種政治意識型態。相對於先前其他相關研究，這個定義有三個特點。首先，它強調以戰後作爲時間的切割點。就時間來說，這兩種意識型態當然都受到先前就已存在的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影響；本文時間點上強調「戰後」，是要突顯戰後臺灣特殊政治與社會脈絡，特別是族群互動情境，對於這兩種意識型態發展之重要影響。其次，所謂「民族想像」，牽涉到對於一個民族（國家）的人民與領土範圍，以及民族（國家）歷史與未來發展之看法。⁽³²⁾民族想像之特性排除了沒有政治意涵的鄉土意識；雖然鄉土意識可能是民族主義意識之先聲，但是如果缺乏適當的社會與政治條件，將不一定會發展成爲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最後，本文定義中強調兩種意識作爲一種「對抗論述」之政治性格。⁽³³⁾上述兩種意識是在群體衝突狀況下，所發展出來的動員及說服工具，而不只是共同生活經驗自然而然產生的意識。所謂的「共同」生活經驗，通常是在與外人對比狀況下產生之體認；如果與外人沒有利益衝突，彼此的

(31) 例如，中國論壇社，〈「中國結」與「臺灣結」研討會論文專輯〉，《中國論壇》25:1（289期，1987）；黃國昌，《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2）；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廈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32)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33) 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1（1996），頁129-210；黃俊傑，〈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

差異可能不會被認為構成「問題」，也就沒有強烈必要去發展與這種差異有關的對抗性論述。

在此一界定下，本文所欲探討的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就其特性來說，比較類似 Alberto Melucci 在討論社會運動時，所提出的「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 之概念。根據他的定義，「集體認同是由一群互動中的個人，因為關心自己導向以及他們行動所將發生之場域中的機會與限制，而建構的一套互動、分享的定義」。⁽³⁴⁾ 集體認同的具體內涵，除了包括界定「我們是誰」以及「他們是誰」之外，也包括了為何「我們」處在不利地位，以及是否有行動機會之看法。他們通常是一種防衛性的對抗論述。如果是具有民族想像特性的集體認同，則上述內涵就包括對於民族成員、領土範圍、歷史淵源、當前危機處境、敵人是誰、如何才能達成未來理想境界（或民族榮耀）之論述。在這種狀況下，民族想像發生的脈絡，不可避免會影響到對歷史的看法。⁽³⁵⁾

至於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民族想像的具體內容，將在下面提到時詳述。

(一)一九七〇年代以前：中國意識全面優勢

為何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大中國史觀在臺灣社會中沒有被挑戰？這可以由中國意識的全面優勢去理解。在對日抗戰期間，中國大陸上的中國意識是以日本作為民族敵人。在戰後初期，此一中國意識被新政權及移民直接帶入臺灣。當時絕大多數臺灣人民對於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都抱著極大熱忱與期望。基於與中國在血緣及文化傳統上一脈相承的認知，多數臺灣知識份子（包括歷史學家）及人民都毫無疑義地接受「臺灣與中國是一體」之觀點。⁽³⁶⁾ 對於歷史教科書中刻意強調臺灣人的抗日，或者不提日本統治時期建設與成就，由於光復前後臺灣人民反日本殖民統治，以及回歸祖國的情緒高漲，也不太有什麼異議。雖然這樣的觀點與熱切的心情，因為回歸中國統治不久之後，與中國實際的接觸

(34)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

(35) 黃俊傑，〈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

(36) 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收於《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6），頁 1-9；歐素琪，〈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與實踐〉，頁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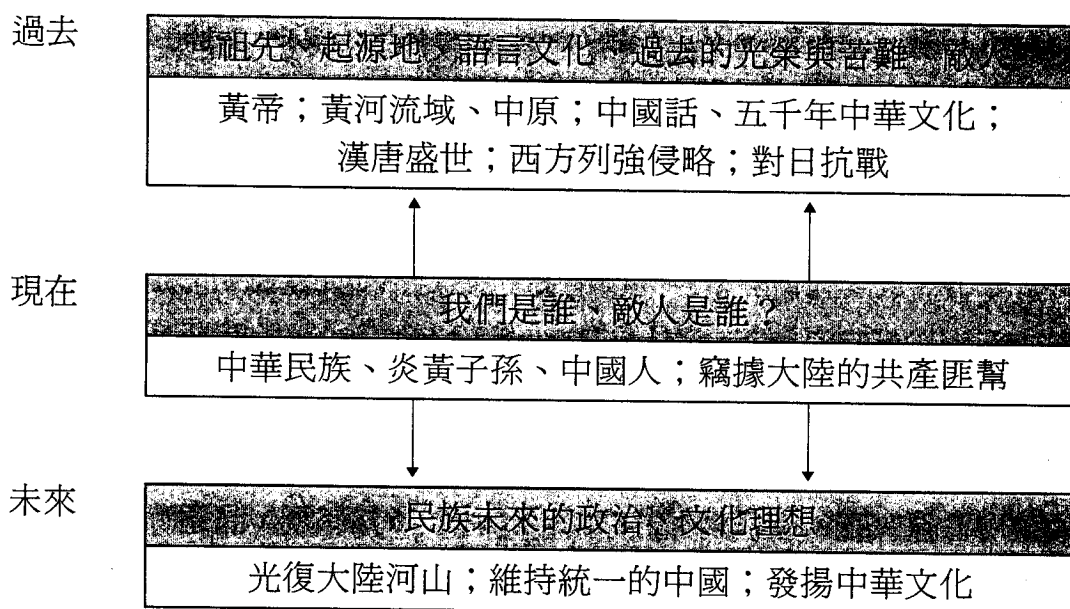
經驗而有所轉變，甚至引發不滿和衝突，但是，在「二二八事件」的鎮壓與屠殺之後，許多本省精英流亡海外，島內殘存的精英噤若寒蟬，幾乎沒有什麼人敢再對政治事務公開地提出異議。因此，雖然戰後初期臺灣史研究因為官方設館修纂「臺灣省通志」之鼓勵，及民間史學者的努力，而一度盛行；但是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臺灣研究民間刊物陸續停刊後，便即衰退。⁽³⁷⁾此一時期的臺灣史研究，大致上在中國意識指導原則下運作。「二二八事件」與日本統治時期都成為臺灣史研究的禁忌話題。

另一方面，在外省人方面，由於大多數第一代外省人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他們對於「二二八事件」所知有限，到達時臺灣已經在中國統治下過了三年，臺灣人民已經不再像剛光復時那麼熱烈歡迎他們，而且臺灣的日本文化風味猶在。在一九五〇年代「反共復國」使命高於一切的政治氣氛下，外省人因為有對日作戰經驗，而且認為臺灣只是暫時居留地，絕大多數都不認為有必要多了解臺灣歷史——特別是日本統治經驗與日本文化——，他們當然也不會對上述教科書內容提出異議。在一九五〇年代，臺灣社會的中國意識為了因應大陸撤退之新情勢需要，內容上有了轉變，主要民族敵人變成中共。然而，為了將日本文化色彩相當濃厚的臺灣再中國化、以成為「復興基地」需要，仍然持續強調日本是民族敵人之歷史經驗。在「動員戡亂時期」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籠罩下，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化與歷史，揚棄或鄙視日本文化影響，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民族」教育目標。此一時期中國意識具體內容如圖一所示。

然而，除了比較消極的害怕鎮壓因素之外，造成大中國意識及史觀沒有受到挑戰的原因，也包括了統治者全面控制了文化語言政策、意識形態生產工具，以及外在國際政治情勢之配合。其中，文化及語言政策——特別是國民政府在統治臺灣後，一年後即全面禁用日文、日語的政策——之影響，主要發生在第一代本省人身上。臺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原本就不普遍的漢文文字文化，已經漸漸被日文文字文化所取代。⁽³⁸⁾倉促禁用日文之措施，造成一整個熟悉日文，但是

(37) 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楊雲萍，〈臺灣的研究〉，收於楊雲萍，《臺灣的文化與文獻》（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0；1948年原刊），頁25-27。

(38) 在日本統治末期，到底有多少臺灣人通日語，缺乏較有系統的統計。根據Samuel P. S. H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32 所載，以日本政



圖一 「動員戡亂時期」中國意識的民族想像內容

資料來源：修改自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1996)，頁146，圖一。

不熟悉漢語(北京話)世代，在官方所控制的文化場域中，突然之間成為半文盲，必須學習新語言。因此，他們在面對新的大中國歷史觀點時，即使覺得自己的經驗或觀點受到壓迫或扭曲，也沒有順手的文化工具可以發聲抵抗。

其次，國民政府透過全面控制文化教育機制，以及編撰教科書，將大中國歷史觀點逐漸轉化為官方版本的正統歷史記憶，在教育過程中傳授給戰後第二代。這造成戰後出生長大的本省第二代，在歷史記憶、經驗、與語言文化上，和父母代的斷裂。除此以外，官方所控制的學術生產系統，特別是在文法與社會科學的學術知識生產體系中，大中國意識史觀更是佔有支配性的地位。

更重要的，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國際政治環境，也使得大中國歷史觀點因為外部國際政治需要，在臺灣內部取得難以撼動的合法地位。當時國民政府在國際上和中共爭奪中國代表的正統地位，在美國的支持下，臺灣仍然具有相當優勢。因此，雖然中共自建國以後，每年都在聯合國提出中國代表權議案，但是臺

府普查資料顯示，1940年時，臺灣人能夠讀寫說日語的比率是53.05%；而王育德，《臺灣》(東京：弘文堂，1980)，頁133則認為，在1944年臺灣民眾已經有71%以上通日語。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臺灣風物》37:1(1987)；37:4(1987)。

灣在一九七一年以前仍然保有聯合國一般會員國及安全理事會之席位。在國際認可方面，如果以正式締交邦交國數量來說，國民政府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退讓出聯合國席位之前，在國際上仍然得到比中共更多國家（68 國比 53 國）承認。在這樣的國際政治現實下，國民政府所宣稱的「正統中國代表」合法性，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內部質疑。即使當時臺灣內部有一些民主改革要求（例如，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自由中國》雜誌為首的政治評論，以及「中國民主黨」組黨工作），但是，國民政府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似乎沒有爭議。⁽³⁹⁾

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大中國的歷史觀點在上述內部及外在條件配合下，根本沒有受到有力的公開挑戰。

（二）一九七〇年代：外交挫敗下臺灣意識萌芽

相對於國民政府遷臺的前二十年，一九七〇年代對於中國意識在臺灣社會中的地位來說，是一個重要轉捩點期。這個轉變先由外部環境開始。一九七一年臺灣被迫退讓出聯合國席位給中共，外交局勢急遽逆轉。僅僅在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兩年中，就有 26 國與臺灣斷交，而由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九年十年當中，有 50 個邦交國與臺灣斷交，與中共建交。⁽⁴⁰⁾ 也因此，由一九七一年以後，國際上正式承認中共的國家數，便開始超過承認臺灣者，臺灣在國際外交戰場上節節敗退。這其中比較引起一般民眾注意、及政府強烈反應的外交事件，是一九七二年「中日斷交」、一九七三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及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到一九八〇年時，臺灣只剩下 22 個邦交國，而中共則增加到 124 個。此一情勢對於國民政府「正統中國」的政治宣稱構成了重大打擊。

在外部衝擊的挑戰機會下，臺灣內部再度出現一些政治改革或民主化訴求，其中比較引起執政者注意者，包括：一九七一年改組後的《大學》雜誌社，一九七五年創刊的《臺灣政論》，以及一九七九年創刊的《美麗島》雜誌。⁽⁴¹⁾ 整體來說，

(39) 黃光國，〈「臺灣結」與「中國結」：對抗與出路〉，《中國論壇》25: 1（289 期，1987），頁 1-19。

(40) 參見衛民，《中華民國的雙邊外交：功能主義外交的檢討》（臺北市：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1；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72-1992）》（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

(41) 見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 40 年》（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88）。

這些挑戰者共同點是：他們大多數是在國民政府完全控制下，受教育成長的戰後第二代。相對於前面世代，他們沒有「二二八事件」親身經驗、也接受了完整中國意識教育。因此，除了能夠使用流利國語以外，他們也受了中國歷史與文化意識薰陶，有相當多的人在民族認同上接受自己是中國人、也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一個省）。而這些民族想像與認同，並不光只是來自課堂中書本教導而已，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國家動員戡亂處境、反攻大陸的國家任務、國際社會對於臺灣作為中國代表的認可與支持、等等教室外環境，也都支持或呼應這樣的民族想像。

不過，本省人在現實政治權力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卻也造成越來越多本省籍反對精英不滿，而開始以直接或迂迴方式，質疑大中國的民族想像架構在政治上歧視本省人。⁽⁴²⁾ 因此，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們在「追求民主改革的忠誠反對者」基調上，開始提出挑戰。他們的政治訴求，是在承認既有中華民國政治體制的前提下，要求回歸憲法所規定的普遍民主政治權利，並不涉及國家認同或民族主義訴求。嚴格來說，這個時期挑戰者的政治民主化及本土化訴求中所隱含的「臺灣意識」，因為缺乏一套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與文化之完整論述作為基礎，也沒有追求政治上獨立自主的目標；它只是追求在既有政治體制之中，族群政治平等的訴求，還算不上是有民族主義意涵的「臺灣意識」。

國民政府在面對內外交相的統治合法性危機時，所採取的應對策略有兩個原則：一是開放部份選舉及進用本省籍青年才俊（「吹臺青」本土化政策），讓本省人有機會參政；⁽⁴³⁾ 二是強化「中國民族主義」訴求。為了壓制臺灣內部要求民主、及擴大本地政治參與的聲浪，國民政府更是極力強調「動員戡亂」國家危難情境，不容許內部的分歧與動亂，削弱了內部團結力量。也就是透過強化中國意識的民族想像，來壓制民主化及本土化訴求。

國民政府遷臺以來，為了向國際展現自己代表「中國正統」的合法性，便極力強調自己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上，比中共更具有代表性。因此，國民

(42) 例如，1975年黨外雜誌《臺灣政論》中，就出現多篇以比較間接方式討論「國會全面改選」議題，或直接質疑高普考中區分省籍問題，它們都引起相當多討論（見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頁160-162）。

(43) 王振寰，〈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1（1989），頁71-116。

政府早在一九六六年，便在臺灣內部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回應中共「文化大革命」。(44) 因此早期「中國民族主義」訴求，是以臺灣社會外部（中共政權、國際社會），作為主要宣揚或對抗對象。然而，一九七〇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意識民族想像的重新強調，則有新增的內部社會重整意涵。因為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臺灣本土語言，甚至日語有復甦跡象，執政者因而重新發動另一波「推行國語運動」去加以對抗。(45) 在這一波「推行國語運動」中，打壓本土語言的政策甚至較過去激烈。除了限制政府機構、學校內使用的語言之外，也對於廣播與電視節目中，「方言節目」播出時數加以規範，要求必須逐年減少。(46) 對於此一時期開始受中小教育的世代來說，本土語言與文化被貶抑為低俗的方言與文化是共同經驗。

另外，政府也透過各種文化活動宣揚大中國民族意識。在一九七二年中日斷交以後，國民政府為了激發起一般民眾反對日本「以怨報德」的民族情操，並回應中共宣稱抗日戰爭主軸是共軍的說法，乃透過公營中國電影公司拍攝一系列抗日電影，來宣揚中國民族主義。(47) 這些文化活動的附帶目的，在於喚起民眾在抗日戰爭期間舉國團結，以及終能獲得最後勝利之記憶，並且壓抑部分臺灣民眾懷日情結。

這些文化活動所標榜「大中國正統史觀」，加上民族主義的國難訴求，所激發出來的情操，都不是單純民主訴求所能抗衡。這也埋下了國民黨政府能夠利用中美斷交後，民眾情緒浮動不安之際，在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鎮壓本土性民主運動的可能性。才剛萌芽的臺灣本土意識更被刻畫為分化團結、與臺獨勾結之

(44) 見楊聰榮，〈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

(45) 根據當時推動此一運動的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在1970年11月26日發函給各政府機關公文顯示，這一波加強推行國語運動發生的背景，是：「臺灣地區，光復後推行國語甚著成效，近年來轉入低潮，方言甚熾，推行國語組織亦欠健全，人員經費均遭刪減影響工作推動」（收於張博宇主編，1987: 156）。除了「方言」以外，該項辦法也特別規範公教人員不得在工作場所使用外語、或電影院播放外語（它是針對「日語」）。

(46) 李金銓，〈電視文化何處去？——處在中國結與臺灣結的夾縫中〉，《中國論壇》25:1（289期，1987），頁148-158。

(47) 見黃仁，〈電影與政治宣傳〉（臺北：萬象圖書公司，1994）；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中國電影史料研究會，1997）。此一時期出品的抗日電影較著名的有《英烈千秋》（1974）、《八百壯士》（1975）、《梅花》（1975），及《笕橋英烈傳》（1977）。它們在上映時，都有很好票房成績。

「地域意識」。(48)

(三)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意識崛起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對於臺灣民主政治及臺灣意識發展，都具有關鍵性影響。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嚴厲鎮壓黨外精英，反而引起民眾同情。(49) 而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更因為國內外發生一連串重大事件，(50) 使得國民黨過去宣稱「大有為政府」形象受到很大打擊。這些事件，造成許多沒有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戰後第二代，因為體認到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之問題，開始比較能夠接受臺灣政治本土化，及民主改革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反對運動陣營內也因為美麗島事件後領導精英斷層，激進理念與新世代領導人逐漸浮現，並且在不同路線競爭中漸漸取得優勢。針對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論述，反對運動陣營提出「臺灣民族主義」訴求。除了指出政治權力分配機制不民主，也開始強調過去國民黨政府大中國意識主導的政策，壓迫臺灣文化與歷史記憶。(51) 反對運動也透過黨外雜誌及舉辦群眾活動，向一般民眾鼓吹具有民族想像意涵的臺灣意識。在雜誌部份，黨外雜誌中幾個主要系統，例如，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以及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八十年代》及《生根》系列，都以定期專欄介紹臺灣歷史人物與事件。在群眾活動方面，則以使用臺語、演唱臺語歌謠，及講述臺灣歷史故事，去激發參與群眾臺灣意識的民族想像。(52) 此一時期由民進黨所提出之臺灣意識民族想像內容如圖二所示。

在這樣政治環境及理念推動下，「臺灣主體意識」逐漸成為民間文化活動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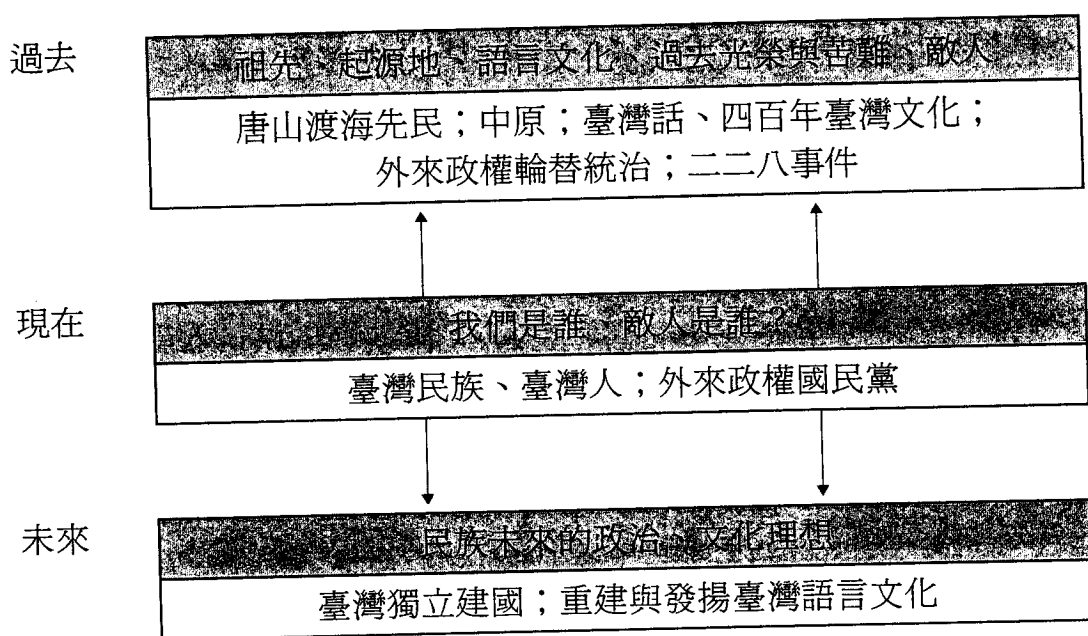
(48) 翁秀琪、陳慧敏，〈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收於翁秀琪、蔡篤堅、陳順孝等，《新聞報導如何再現事實？語言層面的探討——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8），頁22-24。

(49) 黃光國，〈「臺灣結」與「中國結」〉；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40年》。

(50) 包括餽水油事件、十信金融風暴、陳文成命案，以及江南命案等等。

(51) 參見 Hermann Halbeisen,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T'ai-wan I Shih): Facets of a Continuing Debate," in E. K. Y. Chen, Jack F. Williams, and Joseph Wong, eds., *Taiwan: Economy, Society, and Histor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pp. 235-250。例如，黨外雜誌《生根》十二期，陳樹鴻所寫〈臺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一文，主張將臺灣意識由過去只是民主化訴求背景，提升成為主要訴求。

(52) 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



圖二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民進黨臺灣意識下之民族想像內容

資料來源：修改自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頁186，圖六。

術活動新的發展方向。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臺灣文化界與知識界對於所謂「臺灣結」和「中國結」的討論，由文學領域，延伸到其他領域（包括歷史與社會科學），說明了臺灣意識崛起、與中國意識逐漸形成分庭抗禮之趨勢。⁽⁵³⁾ 戰後出生的第二代文化知識份子及一般民眾，為了對成長環境有更多了解，開始試圖瞭解過去長期被忽略的臺灣歷史及臺灣文化。這個轉變清楚地反映在此一時期，臺灣歷史研究及書籍的大量增加之上。

在學院歷史學研究方面，如果我們由臺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⁵⁴⁾ 研究

(53) 中國論壇社，〈「中國結」與「臺灣結」研討會論文專輯〉；施敏輝，《臺灣意識論戰選集》；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1999）。

(54) 這是作者根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所蒐集之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整理而得。本文只分析碩士論文，是因為博士論文在學術傳統傳承上要求較碩士論文嚴格，更不易即時反應外在環境變化而接受新興研究課題。由於本文希望掌握臺灣史研究崛起、進入學院之時機，以論證其發生原因，分析碩士論文較能達到此一研究目的，故而沒有將接近三百篇博士論文納入分析中。根據本文一位匿名評審提供之資料，如果將博士論文也納入（一共 2,008 篇），臺灣史與中國史比例將和表三略有不同，特此列出以供參考：

	1945-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1945-2000
中國史	100	93.6	80.6	76.6	66.0	73.0
臺灣史	0	3.2	6.9	10.9	23.2	15.9

主題來看，則可以發現，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完成的 16 篇碩士論文中，完全沒有以臺灣史為主題；由一九七一到一九八〇年之間完成的 323 篇中，只有 17 篇（佔 5.3%）以臺灣史為主題（參見表三）。在一九八〇年之前，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主要是以中國史，甚至是以西洋史為題目，少有臺灣史論文。這種情況到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才略有改變。由一九八一到一九九〇年當中，532 篇碩士論文中，有 48 篇（佔 9.0%）以臺灣史為主題；一九九一到二〇〇〇年中，臺灣史比例才增加到 25.7%（859 篇中有 221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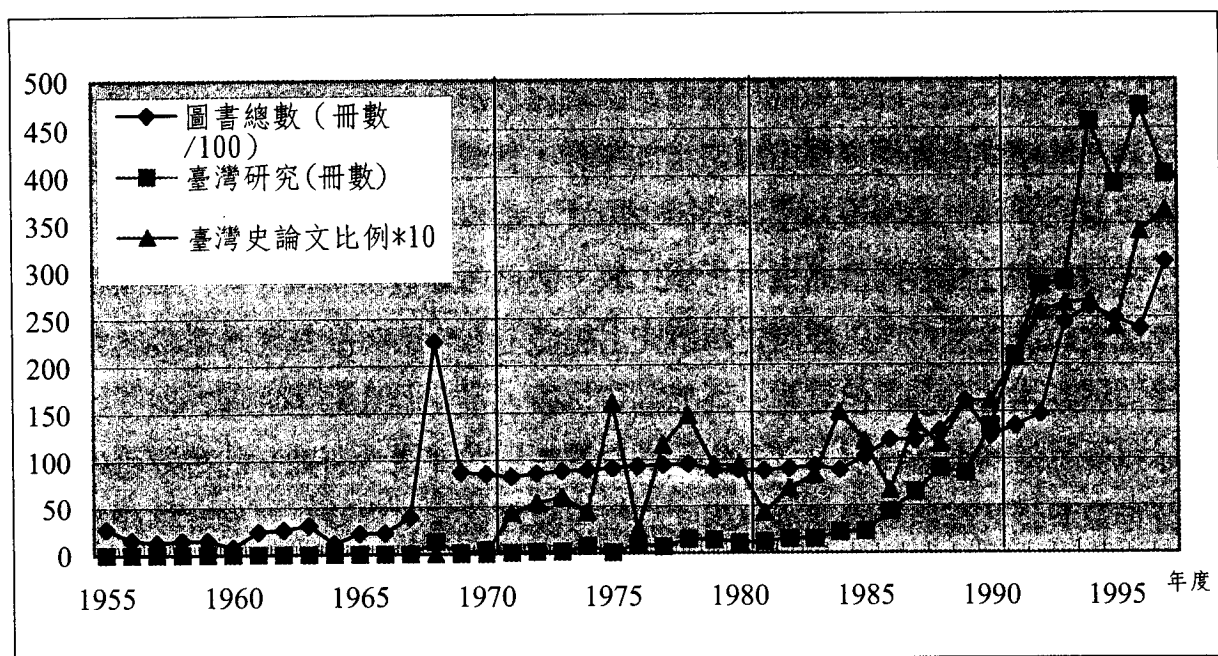
表三 臺灣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主題分佈，按年代區分

單位：篇

畢業年度	研究主題				小計
	臺灣史	中國史	他國史	其他	
1956-1970		14 (87.5)	2 (12.5)		16 [0.9]
1971-1980	17 (5.3)	252 (78.0)	42 (13.0)	12 (3.7)	323 [18.7]
1981-1990	48 (9.0)	401 (75.4)	75 (14.1)	8 (1.5)	532 [30.8]
1991-2000	221 (25.7)	518 (60.3)	101 (11.8)	19 (2.2)	859 [49.7]
小計	286 (16.5)	1185 (68.5)	220 (12.7)	39 (2.3)	1730 (100.0)

說明：[]內為直列百分比；()為橫行百分比。

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臺灣歷史不僅難登學院學術研究殿堂，在學院外一般文化出版市場中，臺灣歷史書籍也相當缺乏。如果由目前市面上所存各種被歸類為臺灣研究書籍出版時間來看，可以知道臺灣研究書籍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特別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才突然大量增加。圖三列出了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九八年臺灣圖書年出版量，以及臺灣研究圖書數量的增加趨勢。前者是政府所公佈官方統計數字。關於後者——「臺灣研究」書籍，本文以南天圖書公司所出版之《臺灣研究總書目》（2000年版），所蒐錄三千多種臺灣研究圖書作為基礎（見附錄三



圖三 臺灣圖書出版量、臺灣研究書籍，及臺灣史碩士論文時間趨勢圖，1955-1998

的說明)。就該書目所蒐集 3,100 冊作者認為屬於「臺灣研究」的書籍來看，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出版者只有 80 冊（最早是 1968 年）。⁽⁵⁵⁾ 然而，臺灣圖書出版數量在一九七〇年代便開始大量增加。

由於兩者數量相當懸殊（參見附錄三原始統計數字），為了便於進行增加趨勢的比較，我們將所有圖書數量除以一百，再和臺灣研究相關書籍數量做年度比較。由圖三的趨勢圖可以看得出來，雖然臺灣圖書種類出版量在一九七〇年代及一九九〇年代各有一次突然大量增加的情形，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也有逐年升高情況，但是臺灣研究書籍在一九八七年以後增加的趨勢與速度，卻遠高於一般書籍。以每年出版種類來說，一九八七年以前，每年新出版「臺灣研究」書籍約在 20-30 本左右，一九九〇年增加到近 100 本，一九九五年更暴增到 450 本左右。這說明了

(55) 讀者可能會質疑 1968 年以前，難道沒有關於臺灣歷史書籍出版嗎？當然有，不過主要是由官方或半官方所出版的套書。其中最重要者至少包括，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一九五〇年代陸續編撰出版之《臺灣省通志稿》（1973 年才正式完成問世 146 冊《臺灣省通志》原稿），以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陸續翻印的《臺灣文獻叢刊》及《臺灣研究叢刊》系列叢書。這些套書普及性不高，流通範圍也有限，就本文分析臺灣意識之目的來說，他們在當時並未發揮足夠影響力。

臺灣研究書籍增加，不僅是因為臺灣出版業起飛、各類書籍出版量跟著大量增加而已；它的確反應了社會中因為臺灣意識崛起，對於此類書籍需求增加所致。

爲了將學院內臺灣史碩士論文增加趨勢，和學院外「臺灣研究」成長趨勢相比較，圖三也將以臺灣史爲主題的碩士論文，佔每年歷史學碩士論文的百分比乘以十，以便和臺灣研究書籍成長折線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一九九〇年以前，每年歷史碩士論文中，以臺灣史爲研究主題者，所佔比例很少超過 15%，而且年度之間波動相當頻繁；但是在一九九〇年以後，這項比例則增加到 25%；一九九六年以後更達到 35%。就整體來說，其發展趨勢和「臺灣研究」的書籍可以說是十分相似。就其發生時機及發展模式來說，我們似乎可以說，兩者都受到相同力量——也就是由政治反對運動所帶起的「臺灣意識」——影響。

不過，以開始大量增加時機來說，「臺灣研究」書籍較臺灣史碩士論文略早一些：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立刻明顯增加；此外，就增加比例來說，「臺灣研究」書籍也遠高於碩士論文。這主要是因為歷史學研究所作爲一個社會制度，有其內部運作的邏輯（包括師資、課程、學位論文的學術傳統等），較能夠獨立於外在環境變化影響，繼續維持及複製早經建立起來的中國史課題研究取向及研究主題。無論如何，以臺灣歷史爲主題的碩士論文，以及臺灣研究著作與一般通俗書籍數量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臺灣意識升高，另一方面也構成充實並支撐一個新臺灣史觀之重要基礎。這些學院內外關於臺灣／臺灣歷史研究之累積，對於後來編撰《認識臺灣》教科書，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臺灣意識的崛起與發展，當然不是毫無阻力。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國意識仍然得到較多文化與教育制度性支持的情況下，臺灣意識上升激起了許多中國意識既有勢力反彈。在面對臺灣意識要求以臺灣爲本位，重新認識臺灣歷史的挑戰下，中國意識支持者也以強調臺灣和中國的歷史淵源作爲回應。政府透過官方及半官方文化機構所舉辦或支持的文化活動，直接或間接鼓吹「臺灣和中國一體」之想法。這其中比較顯著的例子，包括強調「唐山過臺灣」的電視劇、電視節目、⁽⁵⁶⁾ 電影；⁽⁵⁷⁾ 另外，「漢聲」雜誌也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之間，推出一系列臺灣人

(56) 例如，臺視播出的「八千里路雲和月」(1989)、中視的「大陸尋奇」(1990)。

(57) 例如，《源》(1979)、《原鄉人》(1980)、《唐山過臺灣》(1985)，見黃仁，〈電影與政治宣傳〉。

民大陸尋根專輯；新聞局官方雜誌「光華」也開始介紹中國文化及傳統（1990年「中國人的註冊商標」系列專欄）。而一九八七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及旅遊之後，更讓臺灣的「大陸熱」（中國熱），達到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新高點。

這個轉變相當劇烈，過去因為長期反共「國策」，對中國介紹都停留在比較歷史與抽象層次，對於現實中國種種狀況，除了宣揚共產主義帶來的災難以外，根本就加以禁止。然而，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為了對抗臺灣意識高漲，政府反而開始大肆宣揚及介紹中國，甚至容忍左派異議者（他們也是支持中國意識）加入行列。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以介紹中國風土人情為主題的電視節目「八千里路雲和月」受到的待遇。該節目早在一九八七年即已開始秘密籌畫，在當時法令限制下，前往中國大陸仍是禁忌，該節目也因偷渡拍片而在一九八八年遭到新聞局扣留中國外景毛片。後來在立法委員黃主文公聽會中，還是由許多民主運動人士為其開播催生，⁽⁵⁸⁾才得以在一九八九年解禁播出。然而在播出之後，該節目主持人凌峰隔年即獲得新聞局金鐘獎「最佳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項的官方肯定；兩年後播出一百集時，更得到許多國民黨黨政高層人士的祝賀。⁽⁵⁹⁾因此，臺灣意識的出現與挑戰，促成了不同路線中國意識者的聯合。這可以由下面的狀況得到進一步看出。

臺灣意識高漲，除了引發執政者及保守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外，也造成民主運動陣營內部辯論與分裂。雖然民主運動陣營中，對於應該多瞭解臺灣歷史有共識，但是一旦牽涉到對於歷史內容應該如何重新定位或書寫的實質討論時，因為不同族群歷史經驗的差異，就比較沒有共識，甚至引起很多爭議。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除了前述的《八十年代》、《生根雜誌》固定討論臺灣史之外，反對運動陣營當中也有不同立場者，在《夏潮》雜誌中發表許多討論臺灣史的文章。⁽⁶⁰⁾

(58) 這些民主人士包括張忠棟、賀德芬、張曉春、李鴻禧。（另外，趙少康、徐佳士、姚立明、王志文、焦雄屏、小野等人也參與「不要讓歷史嘲笑我們」公聽會）。而著名異議人士政治犯柏楊更為《八千里路雲和月百集風華錄》一書寫序。這些都說明了這個節目先前和官方關係並不密切，但是後來卻因為「中國意識」的相容，而備受禮遇。

(59) 以上參見八千里路雲和月雜誌社，《八千里路雲和月百集風華錄（上集）》（臺北：八千里路雲和月雜誌社，1992），頁255。

(60) 在1983年復刊之後，《夏潮》雜誌內定期開闢「思潮與歷史」、「臺灣與世界」等專欄，闡述反對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史觀。

當時他們之間主要分歧點，是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重新認識與定位。一九八三年黨外雜誌《生根》第八期，刊登了高伊哥（筆名）寫的〈後藤新平——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一文。當時編者特別做如此介紹：

從「深根」以來，一直連載的日據時期武裝抗日運動史已告一段落。接著，由我們自己這一代，來詮釋先人在民族運動的另一環——啓蒙運動及民主運動中，所付出的貢獻。首先，我們得對日據時代的社會經濟背景及歷史演變重新了解。本期先談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兒玉源太郎總督任內的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底線為筆者所加）。(61)

由於這篇文章在標題上以「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來定位一位日本殖民統治者，似乎有正面肯定之意，因而立即引來了《夏潮》中吳健民〈請勿認賊作父〉一文的批評：

……所謂「後藤新平是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這類的話，只宜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口中說出，絕不是被殖民、被壓榨的臺灣人後裔所該說的。(62)

《夏潮》集團成員站在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立場上，完全無法接受臺灣人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史觀。因此，除了一貫強調臺灣人抗日以外，《夏潮》也致力於揭露日本殖民政府歧視、鎮壓或屠殺臺灣人民的史實事蹟、及闡述殖民政府各種建設背後剝削的意圖與本質。同時，爲了反制肯定日治成績的說法，《夏潮》集團也特別強調清朝統治臺灣末期的建設。因此，《夏潮》雜誌在批判〈後藤新平〉一文時，編者特別指出：

我們不否認日本在臺灣有一定的建設，牛馬奴隸也需要草秣糧食才能被奴役，日本在臺的建設，基本上是脫離不了殖民政策路線的，而該文卻予以嚴重的忽視。再說，臺灣現代化的建設，也不是自後藤新平開始，而是從劉銘傳就開始了。這也是該文的嚴重疏失。(63)（底線為筆者所加）

(61) 《生根》，1983: 44。

(62) 吳健民，〈請勿認賊作父〉，《夏潮論壇》1: 5（1983年6月），頁66。

(63) 〈〈編者按〉刊於陳逢源著〈後藤新平的殖民政策〉一文之前〉，《夏潮論壇》1: 5(1983)，頁65。

臺灣現代化建設肇始於清朝的觀點，也在《夏潮》雜誌後來許多文章當中一再出現。⁽⁶⁴⁾而《夏潮》集團成員正是後來反對《認識臺灣》教科書陣營中主要的歷史學者。他們反對肯定日治史觀之立場，也構成《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中，主要爭議點之一。

不過，上述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應該如何定位的歷史觀點論戰，因為主要發生在黨外不同團體（本土派與中國左派）之間，在主流媒體刻意忽視、以及被黨外發展路線之爭蓋過的狀況下，並沒有在一般民眾之間引起太大注意與迴響。但是這個論戰培養出了一批反對臺灣意識肯定日治的學者，以及一套反對論述。直到《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事件中，這個議題才因為不同因素配合（見下文），再度被提起，受到廣泛注意。

隨著臺灣意識崛起，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中小學教科書的大中國意識也開始受到公開而有系統之質疑。⁽⁶⁵⁾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教育部在一九八九年為了因應臺灣社會解嚴後的重大變遷，而決定開始進行國中教科書修改時，不可避免的受到增加關於臺灣的課程之壓力。因此，「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通過增加《認識臺灣》三個新科目，可說是對這些訴求的回應。

（四）一九九〇年代：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對抗

承續著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政治轉型，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臺灣社會發生了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首先，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開放民選、總統直選等政治制度變革，落實了過去反對黨臺灣政治民主化要求，也造成過去用來支持中國法統論的制度性基礎逐漸瓦解。其次，民進黨在一九九一年將有條件的臺灣獨立主張列

(64) 特別是戴國輝，〈研究臺灣史經驗談〉，《夏潮》1984: 3 (1984)，頁 29-35。

(65) 例如，于理，〈諸神交戰的土地——臺灣史：文化霸權的競逐場〉，《南方》6 (1987年4月)，頁 14-17；劍南，〈官方說法的迷思〉；江迅，〈照朕的形象——國小教科書的意識形態〉，《南方》7 (1987)，頁 25-31；龍應台，《野火集外集》；林玉體，《臺灣教育面貌 40 年》（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87）；張炎憲，〈當前臺灣史教育問題〉，收於《臺灣當前問題討論會專刊》（臺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88）；戴寶村，〈國民小學社會科臺灣史教材之檢討〉，《臺灣風物》38: 2 (1988)，頁 33-49；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許雪姬，〈國民小學鄉土教材之檢討——以四年級社會第七冊為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 1 (1990)，頁 120-129；劉曉芬，〈我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臺灣史教材的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石計生等，《意識形態與臺灣教科書》；吳密察，〈社會科——歷史〉。

入黨綱，「臺灣獨立」訴求浮上檯面，成爲臺灣政治意識型態光譜中的一部份。等到一九九二年刑法一百條廢止案通過之後，法律無法制裁臺獨主張時，原先被壓抑的臺灣獨立訴求，也就紛紛出現。此一時期出現的主張臺灣獨立團體，除了較著名的臺灣教授協會、建國黨、獨臺會之外，也有許多較邊緣的團體。⁽⁶⁶⁾ 第三，在李登輝接任總統及國民黨主席之後，國民黨權力核心漸漸本土化，本省籍中常委首度過半，外省人逐漸失去政治權力主導權。⁽⁶⁷⁾ 第四，由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〇年之間，全面改選後的國民大會進行了六次修憲，將臺灣的國家架構做了相當調整。其中，在一九九七年通過精簡省級政府之增修條文，讓省虛級化，更是引起極大爭議。以上這些變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政治本土化或臺灣化的漸次實現；它們使「中國意識」對於臺灣和中國政治關連的宣稱，和現實情況越來越脫節。雖然執政的國民黨仍然繼續強調維持「一個中國」及追求和平統一立場，並且在一九九〇年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統籌「中國統一」事宜；但是，「一個中國」已經漸漸變成國家長程目標，而不是現狀的認知或描述。相反的，一九九〇年代以後許多關於國家政治架構的實質調整（特別是省級政府虛級化），似乎比較符合臺灣主體意識原則。臺灣意識已經漸漸由過去比較限於文化或地方認同層次，提升到民族主義的政治層次訴求。

不僅是國家體制，民間對於臺灣本土意識的接受與實踐也越來越普遍。民眾透過建立組織與舉辦活動，來實踐自己對臺灣的認同。這其中一個重要指標是全國性民間團體，特別是學術性團體，也在此一時期紛紛將團體正式名稱，由原先「中國」改爲「臺灣」，或是另成立新組織；例如，臺灣法律學會、臺灣政治學會、臺灣社會學會，⁽⁶⁸⁾ 以及臺灣歷史學會（1995）。以支持臺灣獨立建國爲主要目標的臺灣教授協會也在一九九〇年成立。而這些團體也舉辦各種提倡臺灣民族想像、反對中國民族想像的活動。例如，臺灣教授協會就利用1995年「馬關條約」一百週年時，發起一個「告別中國」大遊行。而臺灣歷史學會更在正式成立大會

(66) 吳明時，〈邊緣臺獨的「構框」與運動參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1998）。

(67) Teh-fu Huang (黃德福), "Elec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Kuomintang,"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Armonk: M. E. Sharpe, 1996), pp. 105-136.

(68) 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

時，同時舉辦了「建立臺灣主體性歷史觀」座談會。⁽⁶⁹⁾ 在此一轉變過程中，兩種意識型態在國家制度與一般民間組織支持的程度上，也有明顯消長趨勢。

在中國意識漸漸失去制度性支持的狀況下，一批堅持中國意識的國民黨精英，於一九九三年離開國民黨成立新黨。他們認為，本土化的國民黨領導階層將和民進黨聯手逐步實施臺灣獨立，因此高舉反對臺獨、捍衛中華民國的中國民族主義旗幟，以對抗日漸高漲的臺獨聲浪、及臺灣民族主義意識。⁽⁷⁰⁾ 新黨成立初期所揭櫫的三大訴求——「反臺獨、反獨裁、反金權」——中，前二者比較引人注意。其中，「反臺獨」是中國意識最鮮明的表現，也是一個民族主義或國家認同層次的訴求。這個訴求與族群本來沒有必然關連，但是卻因為涉及對於文化與歷史界定，而與過去省籍區分的族群集體記憶糾結在一起。對於第一代外省人來說，由於在中國大陸出生、隨後才移民到臺灣的個人生命史經驗，臺灣和中國的歷史淵源關係，在他們看來是不容懷疑的事實。臺灣獨立訴求，強調政治上臺灣不是中國一部份，企圖切斷臺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是一種無法想像、或「數典忘祖」的行為。外省人較不願意接受臺獨的重要原因，是認為臺灣獨立之後，其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將很難受到尊重。因此，雖然他們以民族主義的理由去反對臺灣獨立，但是這種訴求背後有相當明顯的族群區分基礎。

另外，新黨「反獨裁」訴求，則主要是針對李登輝。李登輝總統任內，除了上述被認為「明統暗獨」施政方針之外，最令新黨精英及支持者耿耿於懷、也不斷被引述、攻擊的事件，是他在一九九四年以中華民國總統與國民黨主席身分，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表示自己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以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⁷¹⁾ 闡述「生為臺灣人的悲哀」之意涵。這些話固然表達了許多在日本統治下出生成長之第一代本省人，在面對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認同轉變及期望起落心境，但是這個說法也直接挑戰到許多第一代外省人長久以來接受的信念——尤其是應該如何看待臺灣和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李登輝此一言論在不同族

(69) 見《臺灣歷史學會通訊》，第一期。

(70) 王甫昌，〈臺灣族群政治的形成及其表現：一九九四年臺北市長選舉結果之分析〉，收於殷海光基金會主編，《民主、轉型？臺灣現象》（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頁143-232。

(71) 李登輝「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的說法，1993年便已公開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達過了，但是等到他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時，因為司馬氏日本人身份，才引起「李登輝媚日」批評之軒然大波。

群意識者之間，激起兩極化反應。因此「反李登輝訴求」有族群背景與族群後果。

新黨並不是唯一站出來表達反對臺灣意識、支持中國意識的團體——雖然它是最重要的政治團體；新同盟會、夏潮集團、以及反共愛國聯盟也都有相似立場。除了上述政治性較高的團體之外，文化菁英也在一九九五年以後，在文學場域中，對於臺灣意識反中國立場發動攻擊與批評，特別是《中外文學》的論戰。⁽⁷²⁾

前面提過，戰後國民政府全面忽視日本統治經驗，是否定第一代本省人集體記憶；而且，在二二八事件鎮壓陰影下，第一代本省人不敢起來反抗。然而，經過一九八七年民間發起「二二八和平運動」、政府解除戒嚴、並且由行政院主動調查事件之後，第一代本省人漸漸走出擔心鎮壓的陰影。對於第一代本省人來說，李登輝以總統身分表示自己早年是日本人、並代表政府對二二八事件家屬道歉、賠償，可以說是象徵性地平反了過去政權的壓迫。這些因素之匯集，造成第一代本省人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記憶，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漸漸進入臺灣公共論壇。

然而，在一九八〇年以後臺灣意識發展過程中，第一代本省人歷史經驗的影響比較間接。臺灣主體意識建構，最初事實上是戰後第二代在政治反對運動發起下，以中國意識為主要對手，透過黨外雜誌中對於臺灣現實困境之討論，才成為一個普遍文化現象。為了強化這種新文化意識的正當性，臺灣意識建構者回到歷史當中，為現在行動找尋意義基礎。這牽涉到以不同於大中國意識之方式，重新理解臺灣歷史；特別是重新定位臺灣歷史中不同統治者，以及重新建構臺灣歷史。這些都不可避免的挑戰到過去「大中國史觀」中，以「固有領土」及「中國中心」立場看待臺灣的方式。

在這樣的需求下，重新認識臺灣歷史，特別是日本統治時期，成為一個迫切課題（見前引《生根》雜誌編輯的說法）。過去由於國民政府企圖改正臺民的日化，因此，也連帶排斥日本統治時期所遺留之各種研究成果，而以中文歷史記錄及文獻資料為主要根據，重新撰寫臺灣歷史。此一做法不僅限於日本統治臺灣前之歷史，也延伸到日本統治時期之歷史。因此，臺灣在日人統治時期的各種建設與制度，以及所留下來各種官方檔案及學術研究著作，沒有經過本地人後殖民過程之

(72) 參見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

檢討，⁽⁷³⁾ 與持續性學術性研究，就被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意識的概念下壓抑下來。⁽⁷⁴⁾ 這些日文的臺灣文獻，雖然保存在各種官方檔案蒐集機構（例如臺灣省文獻會）、圖書館當中，但是由於缺乏懂得日文之研究者使用、整理與翻譯引介，它們對於戰後第二代本省人在臺灣意識引導下，開始嘗試去重新認識臺灣歷史時，幫助有限。而且，由於第一代本省人在二二八事件後噤聲，以及因為語言轉換困難，沒有留下太多不同於官方立場的中文歷史文獻，因此，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戰後第二代（本省人）重新建構臺灣歷史——特別是日治時期——時，相當自主。由於既有的中文文獻中，對於臺灣在日據時期歷史的敘述，大多數是在中國史觀之指導原則下完成，因此除了抗日史實之外，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後期文化與社會建設鮮少觸及，不太能幫助我們了解日本統治對臺灣社會所造成的改變與影響。⁽⁷⁵⁾ 因此，有關日據時期臺灣歷史研究，成為臺灣意識出現之後一個重要的新研究課題。因為缺乏既有中文文獻做為參考，很多研究事實上是戰後第二代以新歷史觀點，直接研讀日文著作，包括日據時期留下的及戰後出版者，或重新閱讀舊有史料、挖掘新史料，進行不同詮釋而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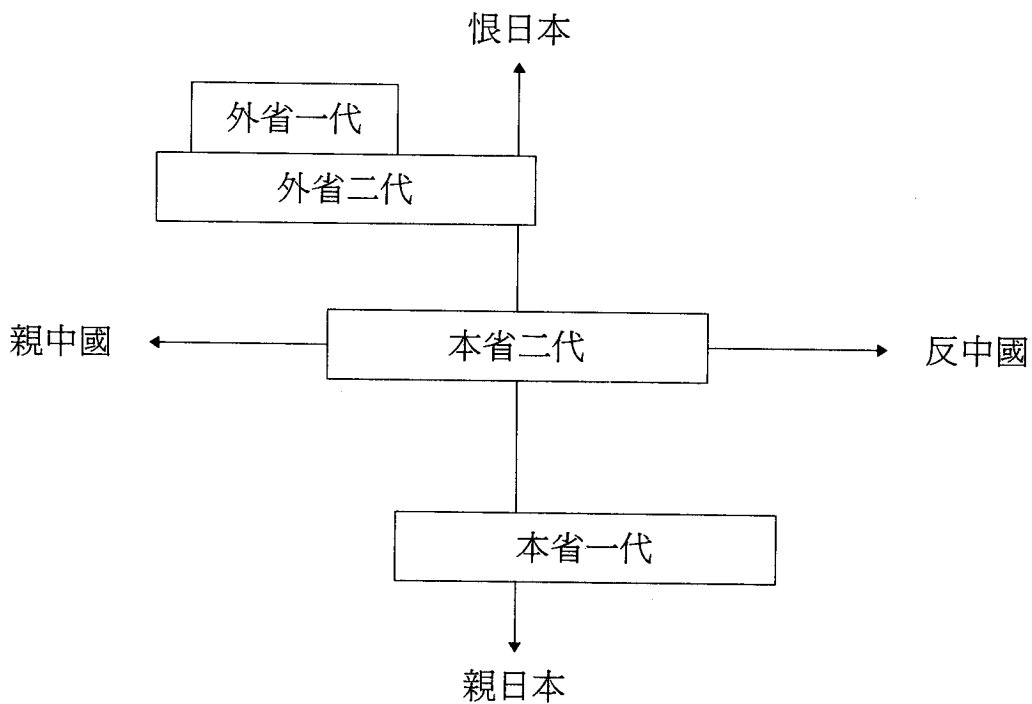
因此，戰後第二代對於臺灣的過去所採取之立場，與第一代外省人的中國意識（親中、反日）想法、以及第一代本省人在二二八事件後之臺灣意識（反中、親日）想法，都有明顯差異。他們以臺灣為主體，重新去思考臺灣和中國、與日本的歷史關係。因此，對於臺灣歷史上各個統治政權對臺灣的貢獻與影響，也形

(73) 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沒有經過後殖民政治與社會過程，去檢討殖民時期種種，是同仁張茂桂先生指出的一個重要論點，特此誌之。

(74) 日人統治臺灣五十年，為了統治的目的，由臺灣總督府主持蒐集許多資料、整理許多文獻、也出版了相當多人類學、民族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固然這些成果因為多數日本作者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書寫，許多結論可能都需要重新檢討，但是，他們蒐集的豐富資料，在理解日本統治之前及統治前期的臺灣社會經濟狀況，是極其寶貴的資產。然而，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基於相當複雜的仇日情結，除了少數與統治有關之行政資料（例如人口、戶籍、地籍、財產）之外，對於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幾乎完全不予重視。這些八十年以前完成的日文著作，特別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895-1917年）所出版的各種調查報告，也是到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才開始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例如，臺灣省文獻會出版《臺灣私法》（陳金田譯）是在1990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三卷分別是1996年（泰雅族）、1998年（阿美族、卑南族）、2000年（賽夏族）。

(75) 雖然戰後初期曾經有一段短暫臺灣研究熱潮（1946-1954年），不少第一代本省及外省學者參與其中，也辦了一些刊物（例如，《臺北文獻》、《臺灣風物》，見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但是這些臺灣研究初期大多以「中國意識」觀點看待臺灣的文化與歷史，強調臺灣與中國文化血緣關連。對於日文著作之引用也多限於日治前臺灣史研究課題與成果。

成了不同於前一世代之評價與對待立場。這個立場的特色，在於企圖比較「客觀」地評價臺灣與中國的歷史淵源，以及日本統治臺灣基礎建設。這些意識內容之間主要區分與相對關係，顯示在圖四中。



圖四 不同世代的「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內容分佈光譜圖

這個論點可以由臺灣史碩士論文研究主題的特性略見其端倪。表四將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九年臺灣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中，以臺灣為主題的 282 篇碩士論文，根據所研究之歷史時期，以及論文完成時期做了一個交叉統計。如果分為清朝以前、清朝時期、日本統治時期、及戰後四個時期，則可以發現臺灣史碩士論文整體來說，以戰後為主題者最多，有 95 篇（佔 33.7%），其次是日本統治時期（91 篇，28.7%），而後才是清朝時期（70 篇，24.8%）。但是如果將他們按論文完成的時期區分，則可以發現，以清朝為主題之論文比例在過去三十年當中不斷下降（由一九七〇年代 64% 降到一九八〇年代 43%，以及一九九〇年代 18%）；而以日本統治時期為主題的論文比例則不斷增加（分別是 12% → 28% → 30%）；以戰後歷史為主題者也是一直增加（6% → 20% → 39%）。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研究比例增加最快時期，正是臺灣意識剛崛起的一九八〇年代；而一九九〇年代則是

表四 臺灣史碩士論文按主題、研究取向與時代區分

論文主題	年代區分			合計
	1971-1980	1981-1990	1991-1999	
時代不清楚、 跨越朝代	2 [11.8]	3 [6.5]	27 [12.3]	32 [11.3]
清朝以前	1 [5.9]	1 [2.2]	2 [0.9]	4 [1.4]
清朝	7	9	11	27
1.官方史	[41.2]	[19.6]	[5.0]	[9.6]
2.民間史	[23.5]	[23.9]	[12.8]	[15.9]
日本時期	2	3	4	9
3.抗日	[11.8]	[6.5]	[1.8]	[3.2]
4.日治		10 [21.7]	15 [28.3]	25 [25.5]
戰後		4	33	37
5.官方史		[8.7]	[15.1]	[13.1]
6.民間史	[5.9]	[10.9]	[23.7]	[20.6]
合計	17 (6.0)	46 (16.3)	219 (77.7)	282 (100.0)
(1+3+5)	53.0%	34.8%	21.9%	25.9%
(2+4+6)	29.4%	56.5%	64.8%	61.3%

說明：() 為橫行百分比；[] 為直列百分比。

對於戰後臺灣歷史研究增加最快之時期。

爲了說明研究取向轉變，我們進一步將上述這些研究三個歷史時期（清朝、日本時期及戰後）的碩士論文，根據其主題再進一步區分爲「官方史」（研究政府制度或統治）、或民間史（研究社會或經濟課題）；以及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是研究「抗日」還是「日治」主題。結果發現，以「官方史」及「抗日」爲主題（比較屬於中國意識的研究題材）之論文比例，僅佔全部臺灣史碩士論文 26% 左右，而且

在過去三十年之中比例逐漸下降(53%→35%→22%)，而研究「民間史」及「日治」題材(比較具有臺灣意識的研究題材)之比例則高達61%，而且有逐漸上揚趨勢(29%→57%→65%) (參見表四最底下兩行小計)。其中，「日治」主題是六個細類中比例最高者(26%)；而以「抗日」為主題者最低(3%)。

就上述資料來看，臺灣史碩士論文中，比較傾向於臺灣意識之研究(特別是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研究)，在一九八〇年代就已經開始大量增加，其中相當高比例的研究者是第二代本省人。而第一代本省人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才將他們的集體記憶注入臺灣歷史的公共討論中。

以上「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發展與對抗，可以說是發生《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遠因及背景因素。這些意識型態對抗對於爭議風波中爭議主題內容有相當的影響。但是，他們並非激發爭議風波唯一因素。

六、《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脈絡分析

本文前面對於《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內容分析顯示，反對者所提出之爭議焦點包括了反臺獨、反對肯定日治，及反對李登輝。這三個議題雖然都在中國意識範疇中，但是各有指涉與重點，它們為何被選擇出來，以及如何結合起來成為主要爭議點？而且，雖然爭議風波主要是針對臺灣歷史不同詮釋立場，但是不僅《歷史篇》引起爭議，《社會篇》也被批評，只有《地理篇》沒有被質疑。然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李慶華等人對於《社會篇》所提出「宣揚臺獨理念」之質疑(以「國家」稱呼臺灣等)，其實也適用於《地理篇》。的確也有外人指出《地理篇》有類似問題。中國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褚亞平就針對《地理篇》中以「國家」來定位臺灣及臺澎金馬之做法與政治暗示，例如，將臺澎金馬作為一個鄉土地理的組合範圍、以及拿臺灣人口密度和其他國家相比，表示強烈不滿。⁽⁷⁶⁾但是，李慶華與潘朝陽卻都認為《地理篇》沒有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遺漏？作者認為，這兩個問題必須由爭議風波發生之社會脈絡，也就是其導火線或立即原因去加以解釋。

(76) 褚亞平，〈《認識臺灣》意欲為何？〉，《人民日報》，1997年11月11日，「海峽論壇」。

雖然《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爆發，一般都認為始於李慶華在六月三日召開公聽會，但是，事實上，這是第二波類似主題之爭議事件。⁽⁷⁷⁾ 根據當事人杜正勝（《社會篇》召集人）指出：

這年臺灣歷史教科書風波有兩階段，第一階段在三月下旬，第二階段是六月初，前者是關於高中歷史教材，後者是國中一年級即將實施的新課程《認識臺灣》。這兩次都和我息息相關，甚至是我為核心。原來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我接受一向主編教科書的國立編譯館的邀請，規劃高中三年全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我提『同心圓』的架構，先學習臺灣及其周邊的歷史，其次中國史，其次亞洲史，最後是世界史。這種構想與過去五十年以中國史為主軸，既無臺灣史，亦鮮亞洲史的教材設計截然不同。經過報紙的披露，在編輯所賦標題的暗示下，我的構想遂有李登輝『獨臺』思想代言者的嫌疑，說我要切斷臺灣與中國的臍帶，要把臺灣引上獨立之路。於是引起統派政客與保守歷史教授的驚慌，接著而來便是文字攻擊，電臺謾罵。【……】第二次風波《認識臺灣》，【……】在六月書稿付印前夕，統派的政客和立委突然召開公聽會，批評《認識臺灣》課文內容反對中國、美化日本、宣揚臺獨。雖然我只負責『社會篇』，但統派政客與學者對我的興趣始終高過其他主編。⁽⁷⁸⁾（底線為作者所加）

杜正勝的說法，將《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針對他的部分，定位為一個先前爭議事件之延續。不過，稍早發生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構想爭議，雖然也經過部分媒體披露與報導，並引發具有強烈中國意識者之攻擊，但是它沒有引起普遍注意。⁽⁷⁹⁾ 這兩次事件所受到的媒體待遇不同，最大差別原因，可能在於後者有政治人物（特別是李慶華）介入，並動員媒體與群眾參與。不過，基於部分中國歷史學者對於杜正勝「同心圓」構想之強烈反對，他們在《認識臺灣》爭議出現時，

(77) 杜正勝在李慶華等人舉行第一次公聽會（6月3日）之前，就已經在《自由時報》定期專欄「臺灣的心」中，發表〈認識臺灣真的這麼為難嗎？〉一文，針對有人以媒體文章或黑函批評他要切斷臺灣和中國的聯繫，提出回應（《自由時報》1997年6月2日第33版）。

(78) 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頁157-158。

(79) 例如，《中國時報》根本沒有報導關於高中歷史教科書即將修改引發之爭議，只在3月29日11版民意論壇中，針對這個議題登了三篇脈絡不明、指涉不清（一般讀者甚至可能覺得不知所云）的讀者投書。

明明知道杜正勝事實上是《社會篇》，而非《歷史篇》主任委員，卻也在李慶華邀約下，加入聲討行列。也因此，這些歷史學者加入，主要是針對杜正勝先前對於高中歷史教科書所提出之新構想，而非《認識臺灣》教科書《社會篇》內容而來。由於他們以杜正勝個人為攻擊目標，因此在爭議事件發生過程中，不斷要求要與杜氏公開辯論，⁽⁸⁰⁾也發動群眾去杜氏公開演講會中鬧場，甚至在事件風波平息之後，所出版的紀錄集中蒐錄之文章，有一大部份仍是以攻擊杜氏同心圓史觀為主。⁽⁸¹⁾因此，杜正勝認為爭議風波有相當部分是針對他個人而來的說法，可以被經驗材料確定。這是為什麼李慶華等人在公聽會中，原本是針對教科書中歷史觀點提出質疑，但是卻將《社會篇》一併納入的主要原因；而這或許也正是杜正勝認為這是政治性攻擊，所以不願意回應的主因。

然而，除了中國意識史學者之外，李慶華無疑是此一爭議風波的關鍵。李慶華發動此一質疑的立即背景又是什麼呢？這個爭議風波事實上和新黨黨中央的關係並不密切。在爭議風波進行的兩個月當中，新黨機關報《新黨通訊》(月刊)只有三篇相關報導；⁽⁸²⁾除了接受民進黨要求辯論的挑戰之外，新黨黨中央幾乎沒有對此風波發表任何正式聲明。新黨和民進黨的電視辯論會，也是由李慶華與學者尹章義及陳昭瑛赴會。到了事件後期，甚至有同黨立委姚立明公開出來表示反對李慶華。⁽⁸³⁾總之，新黨其他政治人物很少參與支持此一爭議風波；根據作者對於四家報紙報導統計，新黨公職人員或知名政治人物，只有13人名字出現在相關媒

(80) 爭議風波一開始，王曉波即要求要和杜正勝就《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進行辯論(《聯合報》，1997年6月7日4版：「認識臺灣吳京強調如期殺青」)。而李慶華等人在教科書已經定案後召開的記者會中，出席的交通大學教授魏鏞仍然在批評杜正勝同心圓理論(《中國時報》1997年7月5日4版：「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擴大」)。

(81) 王仲孚與王曉波合編的《《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文件》中，蒐錄了陳映真〈一個「新史觀」的破綻〉、王仲孚〈欽差院士的尚方寶劍〉、〈談歷史教科書的編輯「奇蹟」〉、潘朝陽〈對同心圓歷史教育的質疑——質問杜正勝教授〉，及朱文男〈亡人之國，先去其史——論杜正勝的御用史觀〉等，都是針對杜正勝之質問。

(82) 《新黨通訊》51期(1997年7月號)登出三篇相關的文章：轉載李慶華〈我對《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的質疑〉、王曉波〈替李慶華教科書公聽會澄清誤會〉、尹章義〈《認識臺灣》不該模糊焦點〉。隔了四個月後的55期(1997年11月號)，才又轉載陳昭瑛6月7日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的文章：〈並不是臺灣人特別可憐〉。四篇總共只有五頁的篇幅。

(83) 見《民眾日報》，1997年6月26日，4版，〈姚立明批李慶華搞統獨問題〉報導。

體報導事件中。⁽⁸⁴⁾ 整個爭議風波似乎完全以李慶華為核心，加上一些親新黨學者及外圍組織，例如新同盟會與夏潮基金會的配合。

新黨中央所以沒有大力支持李慶華，一方面是因為該年稍早新黨內部發生一連串嚴重內訌風波，李慶華與當時黨秘書長郁慕明正是內訌事件兩造當事者。這些家變風波相當影響到新黨團結、支持者士氣、及黨的整體形象。另一方面，由於前一年年底國發會在新黨退出的狀況下，做成凍結省級自治選舉（凍省）決議，一九九七年國民黨及民進黨聯手，準備將凍省決議透過修憲程序入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事件發生時，正值國民大會開會修憲，大多數政治人物注意力都放在修憲議題攻防上，新黨政治人物大多無法分身兼顧《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而且，新黨因為國民大會代表人數較少，無法有效影響修憲結果，因此只能動員學者及民意去阻礙修憲程序。這種狀況也造成許多新黨支持者對於國民黨、民進黨兩黨聯手修憲、「走向臺獨」情勢發展感到焦慮；李慶華在此時所發起《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有凝聚支持者團結意識，以及表達對於臺獨勢力擴張不滿的雙重作用。

李慶華除了邀集中國意識較強的歷史學者之外，也找了部份《夏潮》集團成員參與首場記者會。《夏潮》集團原屬中國意識左派，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剛成立時尚在黨外民主運動陣營中。後來卻因為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歷史定位，及國家前途走向之立場分歧，而與其他本土意識較強的反對運動團體漸行漸遠。這些很早就開始在大中國意識下研究日本統治時期、或日治前臺灣史的學者（特別是王曉波與尹章義），因故沒有被邀請加入教科書編輯委員會。雖然他們對於日治時期歷史的質疑，有許多基於觀點和立場差異，比較難有共識，但是有另一些則涉及具體史實正確與否，因此比較受到《歷史篇》編輯委員會重視。

上述三股力量雖然都支持中國意識，但是他們卻因為不同原因，而參與《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中國史學者主要為了抵制杜正勝同心圓史觀，新黨政治人物為了團結新黨及防堵臺獨勢力，而旗幟鮮明反對帝國主義的《夏潮》成員則主要是為了反對「肯定日治」史觀被放入官方教科書。這些參與原因，也影響到他

(84) 依次是傅崑成（15次）、金介壽（12次）、楊鎮雄（9次）、許歷農（4次）、陳癸淼、林郁方、林忠山（以上3次）、賈毅然、馮滬祥（以上2次）、周陽山、李慶元、曹原彰、陳漢強（以上各1次）。而根據新黨所出版的《新黨公職人員群英錄》（1996），當時新黨有近百名公職人員。

們被回應情形以及事件後續發展。

六月二十四日及七月三日，《認識臺灣》《歷史篇》及《社會篇》編審小組分別召開定稿前最後一次編審委員會。《歷史篇》在該次編審會議中，做了 66 項修改；隨後《社會篇》也做了 94 項修改。根據國立編譯館所整理之修改對照表，我們發現這 160 項修改，的確有接近三分之一（53 項，佔 33.2%）是針對李慶華以及參與公聽會學者所提出之質疑；另外有三分之二則是根據其他各方（特別是編審委員以及各地國中教師）建議做的修改。表五將這些修改結果根據修改性質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和李慶華等人意見相關的修改，一類則是無關的；另外作者也根據修改性質，再將他們細分為「文字修正」、「牽涉到史實認定的修正」、以及「涉及史觀的修正」等細類。由表五可以知道，編審委員會所作修改，半數以上是和上述反對者質疑無關的細部文字修改，至於接受反對者質疑所作的修改，大多數是涉及「史觀」修正。(85)

表五 《認識臺灣》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最後修正結果按其性質分

單位：修正項目；括弧內為直行百分比

修正性質	《歷史篇》	《社會篇》	小計
與反對者的質疑 無關 之修正			
標題文字修正	4(6.1)	0(0.0)	4(2.5)
內容中不涉及史實的文字修正	20(30.3)	64(68.1)	84(52.5)
內容中涉及史實的文字修正	11(16.7)	8(8.5)	19(11.9)
和反對者的質疑 有關 之修正			
「史實」修正	9(13.6)	5(5.3)	14(8.8)
「史觀」修改	22(33.3)	17(18.1)	39(24.4)
總計	66	94	16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國立編譯館提供資料自行整理而成。

不過，如果將李慶華與其他學者的質疑區分開來，則可以發現他們得到的回

(85) 本文將因為牽涉到不同意識型態，而對於不同歷史事件、不同歷史時期、應該採取不同立場與稱呼方式的爭議而引發之修正，稱為涉及「史觀」的修正。

應有重大差異。李慶華 32 點修正意見（參見附錄一）中，被完全採用的只有 3 點（《歷史篇》12、《社會篇》「教師手冊」15、16）、部份採用的有 4 點（《歷史篇》4、8、11，《社會篇》「教師手冊」14），其餘 25 點則完全沒有被接受。而這些被接受修正中，絕大多數是跟「史觀」有關之稱呼（「日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戰後」改為「中華民國在臺灣」、加了元朝、明朝中國對澎湖的經營）；它們只佔了編委會針對反對者質疑 53 項修正中的 14 項（約 26%）；另外 39 項修正，其實主要是針對其他學者在李慶華首場公聽會上、以及在隨後報紙媒體讀者投書中，⁽⁸⁶⁾ 對於「史實」的修改建議。有關「史實」的具體建議，幾乎大多被接受了（特別是《歷史篇》）。換言之，雖然李慶華的質疑只有少部份被納入考慮，但是其他歷史學者所提意見，絕大多數都被編審委員會採納。《歷史篇》編審委員會在修正會議後的記者會中，也對於沒有採納的部份一一加以說明。相對來說，《社會篇》編審委員會所作修正，就比較沒有受到反對者質疑之影響。⁽⁸⁷⁾ 由於杜正勝認為反對者主要是針對他個人而來，因此對於這些人的辯論邀約以及對於《社會篇》質疑內容，都不太理會。

編審委員會的反應，讓多數提出質疑的歷史學者雖然不完全滿意，但是也就暫時封口了。相對的，由於李慶華對於教科書臺獨傾向的指控，是針對教科書中對於現況的潛藏性認知而發，涉及到不同立場與觀點；而且又牽扯上批評李登輝，因此引發了與教科書內容沒有直接關聯、但是卻吸引較多媒體注意的爭議，也造成另一波統獨意識形態與族群爭議。

這個爭議風波對於臺灣社會中族群爭議的催化，可以由教科書爭議風波期間，一宗衍生事件見其一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間，臺北市政府打算將原先被長期佔用的中山十四號、十五號公園預定地，正式開闢為公園。市政府也決定，原

(86) 關於 6 月 3 日李慶華舉辦之公聽會的發言記錄，請參見周明德，〈讓學術的回歸學術——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是否妥當公聽會〉，《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文件》（臺北：臺灣史研究會，1997），頁 145-158；關於參與該項公聽會的學者在主要媒體的讀者投書，可以參見王曉波「史實不容扭曲、回歸學術面無關統獨」（《中國時報》，1997 年 6 月 6 日，11 版）；尹章義「《認識臺灣》是知識問題、非意識形態」（《聯合報》1997 年 6 月 6 日，11 版）；尹章義，「史觀與史實間的歷史教材」座談會發言（《聯合報》1997 年 6 月 10 日，11 版）潘朝陽，「殖民政策總是物化臺灣人，先確立臺灣人民主體性」（《聯合報》1997 年 6 月 9 日，11 版）；黃麗生，「人民主體價值在哪裡」（《聯合報》1997 年 6 月 11 日，11 版）。

(87) 事實上，在 6 月 3 日李慶華所舉辦的公聽會中，《認識臺灣》教科書《歷史篇》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秀政曾經到場聆聽，而《社會篇》的主任委員杜正勝則未參與。

先葬在公園預定地北端的日人墳墓（包括日本統治時期第七代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因為與公園景觀設計不符，將予以遷葬。當明石後代來到臺灣，在臺灣友人陪同下見證遷葬儀式時，新黨籍臺北市議員楊鎮雄也特地到場關切。明石後代在儀式上表示明石希望死後安葬臺灣的意願，其臺灣友人黃守禮（第一代本省人）在翻譯時，主動補充說明明石總督當年對於臺灣的建設，與對待臺灣同胞方式異於前面數任總督。未料此舉引發楊鎮雄大聲斥喝，指責黃守禮不應對日本殖民統治者歌功頌德，造成一場口角風波。⁽⁸⁸⁾此一事件被部份媒體報導，當事人也投書新聞媒體，⁽⁸⁹⁾並引發了其他作者跟進。這個事件可以說是延續教科書爭議風波中，中國意識者指責第一代本省人對於日本統治過於頌揚之批評。如果不是因為教科書爭議的刺激，楊鎮雄大概不會去參與明石總督的遷葬儀式，也就不會引起此一意外衝突，而媒體也可能不會如此大肆報導。

教科書爭議以及這個衝突事件，也意外的造成了第一代本省人紛紛站出來在報紙上投書，表達及重新建構他們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集體記憶。其內容除了日本統治時期的建設、秩序之外，也包括了對於戰後初期，本省人因為對於陳儀行政長官公署失望，以及為了反駁官方對於臺灣人民受日人奴化說法，因而開始對於中國人形成負面整體印象：中國政權被視為是貪污、腐敗；中國人被視為不守秩序、落伍。在二二八事件前，臺灣新聞媒體上及民間充滿這一類看法。⁽⁹⁰⁾對於日本與中國的記憶衝突，構成了戰後第一代本省人與外省人族群區分的重要標記。不過，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這些說法變成禁忌話題，第一代本省人的經驗被壓抑了將近四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運動出現、政府也正式道歉之後，他們才開始重新提出這些說法。在一九九〇年代政府機關（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臺灣省文獻會）所採錄的二二八口述歷史中，這些說法才開始再度出現在臺灣公共論述場域中。

(88) 根據《中國時報》記者曾至賢的報導，「前往了解作業進度的臺北市議員楊鎮雄與日方翻譯黃守禮，為了日本人佔據臺灣及明石在臺灣的功過等吵了起來，楊鎮雄高喊臺灣人要有骨氣，不要忘記日本侵略臺灣的歷史，黃守禮也不甘示弱的指楊鎮雄『你不是臺灣人，閃一邊去！』（1997年7月1日8第五版，〈子孫見證，明石總督棺木出土〉）。

(89) 見《自由時報》，1997年7月21日，第九版，黃守禮，〈明石總督與北市議員〉，及楊鎮雄，〈大家有權認識臺灣〉。

(90) 李筱峰，〈解讀二二八〉。

因此，當教科書的爭議風波中出現了中國意識者批評肯定日治的歷史論述聲音時，這些自認為想法被長期壓抑的第一代本省人，在新臺灣本土意識文化團體（例如臺教會、臺灣南社）動員下，便透過各種發聲管道，包括平面媒體投書、專欄，表達一種比較肯定日本殖民統治治理臺灣有貢獻之觀點。在七月中旬比較偏向中國意識的兩大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已經不再以顯著篇幅報導《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事件時，本土意識比較濃厚的《自由時報》及《民眾日報》仍然提供了相當多篇幅，讓讀者表達這些想法（參見表六）。教科書爭議風波演變到後來，意外的成為第一代本省人在傳播媒體上述說二二八事件前後，對於中國統治者失望的機會。

表六 不同媒體對於《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媒體事件次數的分佈，以不同時期區分

單位：直行百分比

時期	中國時報	聯合報	民眾日報	自由時報	總計
6月2日-6月23日	47.8	48.7	22.7	31.2	34.6
6月24日-7月3日	15.2	9.2	20.0	10.1	13.8
7月4日-7月21日	21.7	22.4	34.5	33.0	29.6
7月22日-8月27日	15.2	19.7	22.7	25.7	22.0
媒體事件次數	46	76	110	109	341

不過，這些關於中國的負面說法，在四十年之後再度被提起，並引發熱烈討論與迴響，固然是因為政治禁忌解除，讓很多人敢於表達過去被壓抑的聲音，但是也和這個時期政治背景中，某些新需要有關。一九九〇年代由於統獨國家認同爭議浮上檯面，中國採取文攻武嚇威脅手段，對付臺灣內部日益升高之獨立訴求。在一九九五年臺灣首度民選總統競選期間，中共以試射飛彈作為威脅手段，更是激起了獨派及許多民眾不滿；臺灣獨立訴求所得到的支持度，在此一時期達到新高。宣揚臺灣獨立建國的建國黨，也在一九九六年正式成立。為了反對臺灣被中國統一，獨派團體開始強調並建構為何要反對中國併吞的論述，而戰後初期臺灣民眾對於祖國失望及二二八事件鎮壓，因為能夠和當下中國併吞的威脅形成類比，乃成為符合此一需要的歷史記憶。關於中國的負面印象，因此因緣際會地和

主張臺灣獨立的國家認同立場連結在一起。獨派組織，包括建國黨、臺教會，及其他團體，也因此成為建構及鼓吹此一歷史觀點的主要行動者。

七、討論與結論

《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事件可以說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後，臺灣社會內部民族想像爭議的具體展現。其爭議內容也彰顯了目前臺灣民族想像爭議的一些特性。就國家認同的意涵來說，一般研究者認為包括兩種面向，一是關於國家主權、領土與人民範疇的看法；二是關於國家與國民歷史的看法。⁽⁹¹⁾ 經過長期與中國大陸在社會與政治體制實質分離，以及與中共政權對峙，大多數民眾對於目前臺灣實質有效統治領土、及國民的範疇，僅及於臺、澎、金、馬已經漸有共識；⁽⁹²⁾ 但是對於臺灣歷史應該如何定位，以及臺灣未來應該與其他國家維持何種關係，卻仍然存在著重大歧見。在爭議風波中，我們發現反對《認識臺灣》教科書者，在爭議主題所表達的抗議模式，似乎相當符合上述觀察。就媒體事件中爭議主題出現頻率來說，李慶華在爭議風波初期所提「臺灣是一個國家嗎？」的質疑，並沒有得到其他反對者迴響，反倒是激起支持教科書者激烈回應。對於多數反對者而言，爭議重點似乎不在於「臺灣現在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在於「臺灣未來要如何走」，以及「應該如何詮釋與理解臺灣歷史」。

在這樣的爭論中，「歷史」是爭議雙方用於合理化自己對於臺灣「未來」主張之重要根據。無論是主張「與中國統一」或「臺灣獨立」的陣營當中，都有人透過對臺灣和中國（甚至和日本）歷史關聯之詮釋，來闡述主張的合理性、以及攻擊對手。⁽⁹³⁾ 他們認為自己對於國家未來主張之正當性，是來自歷史事實的自然推

(91)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92) 雖然有些人對於此一現實狀況是否構成一個「國家」仍有不同意見（例如李慶華的質疑）。不過，根據本文分析，顯示這些質疑具有選擇性（光挑《社會篇》來批評，而對於《地理篇》中同樣假設卻視而不見），而且對於其他更重要的社會議題，例如，臺灣全民健康保險或社會福利制度適用範圍不包括中國人民，甚至臺灣人民的中國配偶法律地位相當於準外國人之情況，卻也從來不曾對其隱含的「國民範圍」立場提出質疑。

(93) 血緣與文化傳承的歷史關連，當然不是統獨主張的唯一基礎；也有人比較由現實的生活水準差距、或軍事威脅理由，來支持其統獨立場主張；吳乃德將前者稱為「國家偏好」，後者稱為「國家選擇」。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於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

衍。由於他們也都認為歷史事實只有一種，因此，爭奪歷史詮釋權，就成為國家認同爭議的重要戰場。不過，由於爭論者真正在意或擔心的是「未來」，因此，他們的歷史詮釋立場，會受到有關未來的思考之影響，而刻意去強調和對方的差異。這種為了「未來」政治目標不同，而刻意強調彼此差異的爭論方式，使得雙方的歷史詮釋，漸漸走向簡化的兩極對立。因為，「過去」雖然複雜，但是「未來」卻尚未發生，所以對於未來的想像可以有明確簡單、一以貫之的指導原則。在有敵對性「未來想像」的狀況下，為了說服支持者接受某種未來想像，本來複雜、多面向、缺乏一貫原則的歷史事實與細節，似乎「必須」構成一個清楚而簡單的立場，或者是主要論述；複雜歷史也因此被壓縮成一個簡單符碼。特定歷史事實或事件，更因此成為編織集體記憶的符號。在這種強調與對手的「差異性」以確立認同的運作邏輯與社會氣氛下，對於彼此「相同性」的強調，似乎不合時宜。因此，關於「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般所認為的過去歷史決定了未來政治走向；反而是對未來政治安排的想像，影響了對歷史的選擇與詮釋。也因此，本文強調：關於「過去」的內容爭議，應該由「現在」的社會脈絡中，對於「未來」想像的衝突，去加以理解。

例如，本文提到《生根》與《夏潮》之間對於後藤新平歷史定位爭議中，原本雙方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定位立場差異並不明顯，然而，《夏潮》卻因為認為《生根》「肯定」日本統治，而以「認賊做父」來批評前者。⁽⁹⁴⁾這樣的質疑真正要挑戰的，其實是他們認為對方透過此一歷史敘事，所欲合理化之國家未來走向的主張。臺灣獨立議題在一九九〇年代正式浮上檯面之後，臺灣民族主義建構者為了說明臺灣與中國不同，開始強調臺灣歷史的特殊性。臺灣因為經歷日本殖民統治，而產生與近代中國不同發展軌跡的分歧性，便逐漸被突顯出來。在這樣的脈絡下，過去被國民政府所壓抑的日本記憶，紛紛被召喚出來，作為建構臺灣不同於中國的素材。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的研究、日本總督府官方文獻資料，以及臺灣古

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頁27-51。然而，以血緣及文化傳承作為國家認同政治主張的基礎者，因為訴諸較高道德標準，所激發的支持情操與凝聚力，遠超過以現實考量為基礎之主張。目前臺灣國家認同之爭議，主要是血緣文化論者之間的對立。

(94) 事實上，如果細讀《生根》中高伊哥「後藤新平」一文，便不難發現高文中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基本上也是採取批判立場；但是《夏潮》作者刻意淡化這個部分，而凸顯他們認為高文「肯定日治」之立場，並針對此一立場進行攻擊。

地圖之翻譯出版，都是此一新趨勢之下具體的文化活動。爲了平衡過去國民黨「全面否定日治、只強調抗日」的歷史書寫基調，這些新的文化活動對於日本統治時期建設，有較爲正面的評價。這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立場。因此，中國意識陣營在反對臺灣獨立之餘，也連帶的嚴詞批評臺灣人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在這樣的爭論發生之後，原本雙方對於臺灣歷史的一些共同體認與看法，例如，臺灣與中國在文化與血緣上的歷史淵源，以及日本殖民統治者壓迫臺灣人、臺灣人也曾極力抵抗日本殖民者等，也漸漸因爲不合時宜，而被選擇性的忽略或簡化了。等到一九九七年《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發生時，中國意識者認爲臺灣意識者過份肯定日治（甚至「媚日」），以及第一代本省人對於「中國落後」的簡化性批評，已經逐漸定型成爲標準化攻擊性論述。這種互動方式或許是爲何歷史爭議這麼難以解決的主要原因。

但是，就算對於過去的詮釋之差異是因爲對於未來想像不同所致，我們仍需說明：爲什麼一般民眾會認爲未來的國家（民族）想像是重要的。爲了讓社會有一個清楚而統整協調的發展方向，國家往往會界定一套民族文化或認同作爲指導原則。⁽⁹⁵⁾ 因此，民族想像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一套原則去決定了哪一種文化或歷史記憶將得到國家認可，以及國家制度性資源與力量的保護、提倡，並傳遞給後代。如果社會中存在著不同群體文化與歷史記憶，則在建構民族文化時，國家將會在同質化（一元化）或多元化的原則之間有所抉擇。在戰後臺灣社會中，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都是以同質化做爲政策導向的訴求。在同質化政策導向下，弱勢者擔心自己的歷史記憶或文化將不會受到優勢者尊重，甚至將面臨消失之命運。如果族群成員相信唯一能夠用來區辨或界定族群的標準，是獨特語言文化及關於祖先的歷史記憶，則族群文化及歷史記憶之消失，將意味著族群滅絕。因此，在民族想像爭議中，有族群意識的行動者最在意的，其實是自己的文化或記憶會不會消失掉。他們通常會藉著對於下一代歷史與文化教育內容的爭辯與堅持，展現出這種擔心。這種追求保存我族群文化認同之動機，正是吸引一般人參與族群衝突的主要原因。這或許是爲什麼一般民眾在明知不可能得到實質政治權力或經

(95)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濟利益的狀況下，仍然熱烈支持或參與精英所發動的族群政治運動。(96)

在《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中，爭奪歷史詮釋權背後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具有中國意識者（尤其是外省族群）擔心在臺灣本土意識成爲國家文化體制指導原則之後，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記憶將被一筆勾消。早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當臺灣本土意識文化熱潮隨著政治獨立訴求高漲起來之後，中國意識較強的外省人便感到憂心忡忡。由於臺灣本土意識是爲了反抗中國意識對於本地文化的壓迫而產生，因此主要是以本省人被壓迫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作爲發展論述的基礎，而將中國文化與意識及國民黨政權都當成是外來的壓迫者。(97) 爲了抗衡這樣的發展，中國意識陣營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開始，便不斷對潛在支持者進行共識動員，並在一九九三年新黨成立之後，將這股反對臺灣獨立的力量凝聚起來支持新黨。在一九九四年省市長選舉期間，新黨和民進黨支持者之間發生衝突，以及新黨在選後將臺北市長落選，歸咎於本省籍選民「棄黃保陳」之族群投票效應，更造成中國意識較強的外省籍民眾，產生強烈文化與認同被壓迫的危機感。

在這樣的狀況下，不僅是中國意識的長期支持者，連許多在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本土意識剛萌芽時，曾經批評過大中國意識忽略本土環境與文化的外省人，也紛紛出來表達對於臺灣民族主義可能造成文化壓迫的疑慮。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外省第二代作家朱天心，在一九九四年臺北市長選舉之後，開始擔心本土意識走向會排斥臺灣的中國文化元素及歷史記憶，因而以小說發出：「難道我的記憶不算嗎？」之質疑與吶喊。(98) 在這樣的焦慮中，文化與歷史記憶的維護，顯然是維持認同的重要元素。

類似的文化心理機制也出現在支持臺灣意識一方。臺灣意識崛起，除了因爲抗議過去政府在文化與教育政策上，刻意忽略臺灣文化與歷史，抹煞臺灣人認同

(96) Saul Newman, "Does Modernization Breed Ethnic Political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43:3 (1991), pp. 451-478.

(97) 王甫昌，〈臺灣族群政治的形成及其表現〉。

(98) 這是朱天心最近參與一場以她的小說《古都》(1997)作爲分析題材的論文研討會，在擔任回應人時，對於《古都》創作背景所做的說明。朱天心表示，這篇小說想說的，其實就是本文中所引述的這句話。該場研討會是文化研究學會主辦，文化批判論壇第四場「為何大和解不／可能？——省籍問題中的災難與希望」(2001年5月26日)。以朱天心小說爲分析題材的論文是廖朝陽，〈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都市》看政治〉。

之外，現在中國政府及一般民眾對於臺獨訴求以及臺灣人肯定日本統治的強烈反應，都使本土意識者懷疑中國統治者會尊重臺灣人民的文化與歷史。由於中國政府與人民都認為臺灣獨立的「民族分離意識」，是源於「錯誤的」文化與歷史認同，兩者都必須加以撲滅。在《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平息以後，許多中國學者都在中國官方報紙上，表示強烈反對這套教科書中的錯誤意識。(99) 因此臺灣意識陣營擔心，與中國統一的可能結果是：臺灣文化與認同將再次被中國文化霸權所抹消。(100)

如果認同被認為是團體存在意義的重要指標，那麼民眾採用比較激烈的手段維護文化與歷史記憶，或是不擇手段、不計前嫌的支持他們認為可以協助保護特定文化或歷史記憶的政治人物或政黨，也就比較能被理解。民族想像本來就是以民族存續及民族利益作為最高道德準繩的思考方式。這樣的心理可以說是臺灣目前統獨爭議的社會文化基礎。

最後，關於族群的意涵。本文所稱「族群」是「主觀」的族群分類意識，而不是這種分類意識下所指涉、或是所界定的「客觀」族群身份或是「族群團體」。族群分類意識通常是由自認為構成弱勢族群的一群人，為了反抗優勢族群的不平等對待，以共同祖源作為區分我群與他群之基礎，所發展出來的論述。這種意識的內容通常會包括：(一)一套用來說明自己為何構成一個獨特族群的文化或歷史論述，也就是 Smith 所稱「族群傳說」(ethnic myth)；(101) (二)關於族群的敵人(「他者」或優勢族群)是誰，以及我群受到何種不公平對待的說法；(三)關於理想的族群存在狀態是什麼，以及要如何達成的說法。因為族群分類意識往往是為了反抗不平等待遇而發展，因此族群意識在衝突時特別高漲；(102) 具體的族群意識內容

(99) 例如，《人民日報》「海峽論壇」專欄刊登了龔書鐸，〈為何不讓學生正確認識臺灣？〉(1997年10月30日)；吳履平，王宏志，〈《認識臺灣》要對青少年進行什麼樣的教育？〉(1997年11月6日)；褚亞平，〈《認識臺灣》意欲為何？〉(1997年11月11日)。

(100) 在註98提到的論文討論會中，同樣也是回應人之一的邱貴芬，也以朱天心自己的說法，去回應朱天心的質疑。邱貴芬認為反對「中國統一」同樣也正是因為擔心臺灣文化與歷史記憶在統一後被壓抑，所以也提出：「難道我的記憶都不算嗎？」的質疑。

(101) Anthony D. Smith, "Ethnic Identity and Myths of Ethnic Descent,"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7 (1984), pp. 95-130.

(102) William H. Durham, "Conflict,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A Summary," in Nancie L. Gonzalez and Carolyn S. McCommon, eds., *Conflict, Mig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Ethnic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138-145.

也會因為對於敵人的界定不同，而有差異。

就本文分析的教科書爭議風波來看，其中主要涉及的史觀與意識型態差異，似乎主要是沿著戰後初期「本省人／外省人」省籍分類意識而產生。雖然在爭議的過程中，也有人提到新教科書對於客家人或原住民歷史或感受不夠尊重（參見表二的內容分析），⁽¹⁰³⁾但是它們並沒有成為重要議題，也沒有造成客家或是原住民運動團體出來抗議。然而，在一九九〇年代，當外省人為了反對大環境中本土化發展所造成的文化壓迫，而開始建構弱勢族群意識時，則是以「本省閩南人」為區分對象。

以「族群意識」來分析目前的族群現象，或許較能夠理解當代的族群爭議。許多人認為族群在當代臺灣社會中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第一，經過五十年在中國意識主導的文化環境中社會互動，原先「本省人」及「外省人」之間截然分明界線已經漸漸淡化。第二，許多人不一定認同、或接受自己被這種省籍分類意識所界定的「本省人」與「外省人」身份，有些人甚至可以接受與自己被界定的「客觀」族群身份相左之意識型態。多數行動者也不會承認自己的行動與族群考慮有關連；他們往往會以社會互動中族群界線已淡化、而且自己的集體行動有跨族群支持者為由，說明其行動不是族群動員。

但是，上述兩個理由並不足以說明其行動沒有族群意涵。族群界線在個人社會互動層次之淡化，並不能保證族群作為人群組織或行動原則的重要性，就跟著消失。因為，決定族群意識是否能夠對社會行動產生影響力的一個條件是，根據先前族群分類意識所建立的不對稱制度性安排、或社會結構，是否仍然存在或持續運作。由於結構與制度一旦建立之後，有自己的運作法則及自我維護機能，因此發生變遷的速度通常較意識型態來得慢，而且變遷動力通常是來自制度或結構以外。戰後臺灣文化及教育體制中的中國觀點，在成為國家主導價值之後，透過教學及學術研究機構的逐步建立與擴充，培養了數量龐大的支持者，並且在國家力量支持下，不斷複製此一意識。這使得挑戰性的臺灣意識在發展上面臨相當抗拒力量。臺灣本土意識由一九七〇年代萌芽，開始挑戰國家體制中主流中國意識；

(103) 例如，尹章義指出認識臺灣教科書不尊重客家人。另外，原住民詩人莫那能在《夏潮》基金會王津平的陪同下，到杜正勝演講會場去抗議教科書中以「蕃」稱呼原住民，引發了到場群眾之間互相叫罵（見表一大事記）。

然而第一本帶有臺灣意識觀點的歷史教科書，在將近二十年之後，才得以進入國家文化與教育體制之中。這當中的轉變，並不是共同生活經驗自然而然演變之結果，而是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所動員的集體行動對抗之下逐漸完成。鑑於這兩種對抗觀點和早期省籍族群的記憶與經驗有高度關連，這些集體對抗行動過程中，因此吸引了具有特定族群意識者參與，而參與過程也反過來強化了其族群意識。因此，雖然這個轉變過程是民族想像的對抗，卻產生族群動員的效果。

然而，這種族群動員效果似乎只發生在特定世代中。由本文蒐集的材料看來，參與爭議風波的行動者，幾乎都是戰後第一代或第二代，而少有較年輕世代。戰後第一、二代因為親身經歷了省籍族群分類意識建構與制度化、以及後來族群運動抗爭的歷史過程，較容易接受以族群分類意識，做為詮釋現實世界之思考架構。在教科書爭議過程中，我們看到不同族群在不同爭議階段加入衝突與對立行列中。在這些較早世代中，主觀族群分類意識與被這種分類意識界定的客觀族群身份之間，仍有明顯對應。但是對於省籍族群區分已經在制度上消失（特別是1992年取消戶籍法中本籍身份規定）之後才成長的新世代來說，族群分類似乎比較沒有先驗的必然重要性；他們對於社會的文化導向，也不一定以族群分類想像作為主要統整原則。對於新世代來說，比較重要的統整原則，可能是不同民族想像。雖然就思想起源來說，不同民族想像和早期省籍族群區分有高度關連，但是這種關連在新世代中似乎已經漸漸脫鉤。

不過，族群意識本來就不是文化或歷史記憶差異的必然產物，而是跟維護或挑戰族群不對稱社會結構與制度有關。當新的世代進入不同生命階段，必須面對既存制度與結構，去思考未來社會走向的理想時，其行動與反應是否會受到族群意識的影響，是一個值得觀察的議題。因此，本文所發現的世代差異，究竟真的是世代差異、還是生命階段的差異，需要後續研究去探討。

附錄一 李慶華國會辦公室六月二十三日質疑信全文

認識臺灣？或誤解臺灣？

——對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的質疑

不久前有國中老師打電話告訴我「認識臺灣」這套教科書「內容大有問題」。後來又有國立編譯館職員打電話來要「李委員注意這套教科書」。我是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的委員，也曾是政大歷史系的教授，國中教科書內容有偏差，我當然責無旁貸。我立即要來了這套書詳加研讀，發現它的內容「令人震驚」！於是就在六月三日舉辦了一場「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是否妥當？」公聽會，並邀請了尹章義、王曉波、陳昭瑛、黃麗生、潘朝陽、蔣永敬等六位學者以及相關官員參加，我並於六月五日親自拜訪教育部長吳京談論此事。

我贊成「認識臺灣」的課程，只是發現它的「內容」充滿謬誤。許多地方偏離史實，並且有濃厚的「政治教育」、「政治宣傳」意味，不僅對日本人和李登輝「歌功頌德」，也把「認識臺灣」變成了「為臺獨鋪路」。憲法第一五八條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這套教科書一方面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一方面呼應臺獨人士「我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說法，根本「違憲」。真不知老師如何教授？學生如何接受？家長又如何感受！

我的質疑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能因此打破黑箱作業是件好事。只是很奇怪，站出來讚揚這套教科書和為它辯護的，似乎都是主張臺獨的學者和政治人物，日本產經新聞也稱讚這套教科書「肯定日治」。不知「中華民國」教育部和國立編譯館作何感想？

我的「部份」質疑如下：

《歷史篇》

- 一、為何民國三十四年以前的歷史年代，只用西元年代，而非「中國年代」與「西元年代」併用？
- 二、為何不提中國歷史文獻中有關臺灣的記載？
(例如「三國志·吳志」、三國時期沈瑩的「臨海水土志」、「隋書東夷傳」、元朝時汪大淵的「島夷略誌」等)

- 三、爲何不提三國時代吳國、隋朝、元朝、明朝均曾派兵來臺灣？
- 四、爲何不提宋朝、元朝、明朝時曾派兵戍守澎湖？
(元朝並於澎湖設巡檢司)
- 五、爲何將原國中歷史教科書中的「大陸」均改稱爲「中國大陸」？難道「臺灣」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嗎？
- 六、爲何整本教科書從頭到尾從未出現「中國人」及「中華民族」字樣？
(原國中歷史教科書有「中國人」、「中華民族」——見原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第一〇八、一〇九頁)
- 七、爲何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章名，將「清朝時期」寫成「清領時代」？
- 八、爲何把「日據時期」都改成「日治時代」？(參考第七十一頁)
- 九、爲何完全不提日據時代臺灣同胞和大陸的關係？
(例如孫中山先生三次來臺，興中會、同盟會在臺灣成立分會，羅福星參加同盟會和三二九黃花崗之役，謝東閔、連震東、丘念臺、黃朝琴、李萬居等人赴大陸參加抗戰)
- 十、爲何對熱愛中華民族的「連橫(雅堂)先生」和他所著詳述臺灣和大陸歷史淵源的鉅著「臺灣通史」隻字不提？
- 十一、爲何不提日據時期對臺灣同胞的種種歧視待遇及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同胞所造成的傷痕？爲何不提戰爭時期的臺籍慰安婦？爲何不提臺籍日本兵的痛苦？
- 十二、爲何敘述臺灣光復後歷史的第九章和第十章的章名，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而不用「中華民國時期」？
- 十三、爲何書中多處刻意迴避「光復」二字，而要用「戰後」來取代？
- 十四、爲何「認識臺灣」教科書將原歷史課本中有關嚴家淦總統的部份予以刪除？
- 十五、最後一章「未來展望」中，爲何只提建設「新臺灣」而隻字不提未來的「統一」？
(原國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最後一章「復興基地的成就與展望」中寫有「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歷史第三冊一〇九頁)

《社會篇》

- 一、「三百多年來，居於統治地位的族群很少能平等對待臺灣人民」（第五十三頁）。包括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來臺的外省族群嗎？
- 二、「近四百年來的臺灣，大部分時期都不是人民在當家作主，人民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第六十三頁）。包括兩蔣時期的國民黨嗎？
- 三、老師問學生「有人認為『四百年來的臺灣史是一部悲情的歷史』，你的看法如何？」（第六〇頁）。這句話不是臺獨先驅史明的用語嗎？
- 四、「從十七世紀開始，中國大陸的漢人開始陸續移來」（第十一頁）。寫「從十七世紀開始」，符合史實嗎？（十二世紀宋朝時，即有漢人開始移來）
- 五、「臺灣魂」（第五〇頁）。只有國魂，或民族魂，「臺灣魂」所指為何？誰創造的？
- 六、為何在提到政黨時（參考第六十九頁），只提國民黨和民進黨而隻字不提「新黨」？
- 七、「民國七十九年爆發的三月學運，以野百合為象徵，採取罷課、靜坐、絕食等方式，表達對政治保守勢力的不滿」（第七〇頁）。如果野百合運動列入教材，為何「保釣運動」和「五〇四」、「五一八」、「五二四」社會運動未列入教材？
- 八、為何書中將「大陸」均稱為「中國大陸」？難道「臺灣」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嗎？
- 九、「臺灣每個公民都有身分證」（第十五頁）。「臺灣」是個國家嗎？
- 十、「新臺灣：要蛻變成文明國度」（第八十八頁）。臺灣可被稱為「國度」嗎？
- 十一、為何整本教科書從頭到尾從未出現「中國人」與「中華民族」的字樣？
- 十二、最後一章「營造新臺灣」中，為何隻字不提未來的「統一」？
- 十三、在接著「臺灣魂」（第五〇頁）及「直到最近，我們還是不屈服於中共政權的『文攻武嚇』，正充分展現這種精神」（第五十三頁）之後，老師問學生「你認為古今人物當中誰最能代表臺灣精神？」並在教師手冊中提示「李登輝」的名字（第七十六頁）。這樣恰當嗎？
- 十四、「女：民國八十五年正、副總統由公民直接投票選出，李登輝及連戰膺選為首任中華民國選正、副總統。男：從此我們臺灣人總算可以自己當家作主。」（大家合唱愛拼才會贏）（社會篇「教師手冊」第九十二頁）這樣的

教法合適嗎？

- 十五、「每年十月的壽歌壽酒壽煙，至今回想起來彷彿是帝制復辟。…這一套說謊的本領，已經內化成爲生活的一部分，…」(社會篇教師手冊第一二七頁)。
爲何不提「鴻禧山莊」和「吃五萬塊一粒的鮑魚」呢？
- 十六、「李登輝總統於七十六年宣佈解除戒嚴」(社會篇「教師手冊」第九十一頁)
解除戒嚴不是蔣經國總統宣佈的嗎？
- 十七、近年來的「時事」，適合放入教科書中嗎？

《原國中歷史教科書被「認識臺灣」教科書「刪除」的部份》

- 一、「中國人」(見原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第一〇八、一〇九頁)。
- 二、「中國的和平統一」、「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原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第一〇九頁)。
- 三、課文標題「臺灣的光復」(原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第八十五頁)。
- 四、「臺灣割讓給日本以後，…其處境誠如林獻堂所說的：『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莫過於愚民教育。』」(原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第八十五頁)
- 五、「像羅福星，曾加入同盟會，參加廣州三二九之役，身受重傷；民國初年，他返回臺灣。發展組織，圖謀大舉，光復臺灣，…」(原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第八十五頁)。
- 六、「嚴家淦」(原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第九十九、一〇一頁)。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廿三日

附錄二 「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 媒體報導的事件爭議主題內容登錄原則



臺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包括臺灣史的範圍界定）

- 刻意忽略中國古籍中有關臺灣的記載；刻意不提臺灣人就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事實；「大陸」而非「中國大陸」；貶抑中國，不要當中國人；為臺獨鋪路；忽略劉銘傳治臺；將「清朝」改為「清領」；
- 臺灣史起點：四百年或五千年？；呼籲教育部以「臺灣的主體性」來編纂教材；荷蘭、中國、日本、國民黨等外來政權統治臺灣

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

- 如何看待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成就」、「傷痕」或「遺產」？；對日本過分歌功頌德；刻意忽略、淡化臺灣抗日行動的慘烈，包括次數、犧牲人數的估計，如口焦吧年事件及其他抗日行動；刻意忽略、淡化日本統治中殘暴的部份，例如慰安婦、歧視、剝削、鎮壓；是日「治」或是日「據」？；日本侵略中國、八年抗戰；有沒有日籍神父來臺傳教？
- 過去的教材過分強調仇日的觀點
- 衍生事件：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墓陵的拆遷或保留

對兩蔣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

- 刻意忽略兩蔣的政績；醜化兩蔣
- 過分著重於國民黨的統治

對歷史事件的選擇與遺忘

- 八二三炮戰；白色恐怖；雷震案；保釣運動；嚴家淦；新黨成立；為何不提「五〇四」、「五一八」、「五二四」
- 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民進黨成立

對於島內不同族群歷史記憶的相互尊重

- 原住民未受尊重；義民廟，客家族群歷史記憶未受重視；要悲情或要走出悲情；對不同族群記憶的尊重

臺灣的現在

對現狀的描述：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臺灣是一個國度嗎？臺灣是政治實體嗎？為何稱「大陸」為「中國」？臺灣和大陸是不同的國家嗎？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臺灣？光復？戰後？年號的爭議；「臺灣魂」、「臺灣精神」的爭議；為何不提統一？共同建立新國家？

——將「臺灣史地」正名為「本國史地」；臺灣主權獨立；國號正名為臺灣；臺灣的國民有身分證；

臺灣地理範圍的界定

——臺灣有沒有包括金門、馬祖？

臺灣內部的族群分類

——臺灣沒有「四大族群」，只有原／漢兩大族群；閩南沙文主義，歧視客家人與原住民；製造分化、對立與仇恨；搞清算鬥爭

——臺灣有「四大族群」；臺灣人是平埔族的後代

對現實政治人物的評價

——總統大選後，臺灣人民當家作主；對李登輝歌功頌德；宣佈戒嚴者是蔣經國而非李登輝

附錄三 關於「臺灣研究」書籍的蒐集與整理

本文所選擇的「臺灣研究」的書目，主要是根據南天書局所編輯「臺灣研究總書目」（2000版）作為基礎。該書局自1994年以來，幾乎每年年初都重新修訂、出版「臺灣研究書目」，其篇幅也由1994年的37頁逐年增加到2000年的174頁。這當然不是臺灣唯一的臺灣研究書目，就筆者所知，至少還有下列四種：

1. 黃士旂，《臺灣研究要目（西元1945-1989年）》（臺北：幼捷出版社，1991）。
2. 王世慶，《臺灣研究中文書目（史地之部）》（臺北：環球書社，1976）。
3. 王世慶，《臺灣研究中文書目（社會科學之部）》（臺北：環球書社，1978）。
4.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中文臺灣資料目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編印，1993）。

不過上述這四本臺灣研究要目蒐集的書籍在種類與範圍上，都和本文所欲掌握的「臺灣研究」相去較遠，他們基本上是以「臺灣」作為關鍵字，對單一的圖書館（第一本是以國立中央圖書館、第四本是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或多所圖書館（第二、三本用了國內二十家圖書館）的藏書、碑拓、或各類相關文獻，進行搜尋後得到的結果編印而成。這其中包括了許多在臺灣出版官方的出版品，而且蒐集了許多以中國觀點看臺灣的相關書籍。雖然其中不乏在「臺灣意識」高漲之後才出版的書籍，但是，後者所佔比重較少。因此，就本文目的來說，他們不是理想「臺灣研究」書目清單。相對來說，南天書局在1994年臺灣意識高漲之後所蒐集、編輯之書目，雖然其對早期作品（特別是絕版書）蒐錄完整程度可能稍遜於前幾本，但是其蒐錄標準比較符合本文所欲測量的「臺灣意識」下文化出版品之目的。在缺乏更完整書目作為書單的情況下，本文暫時以這個書目作為基礎去計算「臺灣研究」出版品的歷史趨勢。

由於南天公司書目所登錄的是現有版本之出版年度，而非原始出版年度，作者於是先逐一清查其第一版的原始出版年份，再據以進行出版年度歸納。另外，該書目2000年版時蒐錄的範圍已經相當龐大，一共分為九大類、七十三小類。限於本文目的，我們只將該書目中被歸類為「社會科學」、「史地類」、「語文類」等三大類，與「自然科學」大類中的「民族人類學、族群關係」小類納入本文統計

中。它們一共有 3,100 冊，約佔南天書目 6,000 餘冊的一半弱。

另外，本文也將政府統計中，每年出版的圖書的總量（種）、以及臺灣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中，以臺灣史為主題的論文佔所有論文的百分比，一併列在下表中。

年份	圖書出版數量	臺灣史論文比例	臺灣研究書籍
1952	427	—	0
1953	892	—	0
1954	1,380	—	0
1955	958	—	0
1956	2,763	.00	0
1957	1,549	—	0
1958	1,283	—	0
1959	1,472	—	0
1960	1,496	.00	0
1961	761	—	0
1962	2,404	—	0
1963	2,601	—	0
1964	3,095	—	0
1965	1,104	—	0
1966	2,199	—	0
1967	2,252	—	0
1968	3,950	—	0
1969	22,556	.00	13
1970	8,714	.00	1
1971	8,504	.00	4
1972	8,216	4.35	1
1973	8,547	5.41	2
1974	8,799	6.06	2
1975	8,921	4.35	8
1976	9,109	16.00	1
1977	9,304	2.50	10
1978	9,416	11.54	7
1979	9,520	14.63	15
1980	8,876	9.43	14

1981	8,865	9.30	11
1982	8,776	4.26	12
1983	9,008	6.90	15
1984	9,256	8.33	15
1985	8,822	15.00	22
1986	10,255	11.86	23
1987	12,046	6.67	44
1988	11,982	13.79	65
1989	12,964	11.59	90
1990	16,156	16.13	85
1991	12,418	16.13	135
1992	13,501	20.69	210
1993	14,743	25.53	284
1994	24,483	26.47	288
1995	26,084	26.73	457
1996	24,876	24.00	392
1997	23,801	34.15	472
1998	30,868	36.36	402

資料來源：1. 臺灣圖書出版品總數量：1) 《文化統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行政院主計處)；3) 《中華民國出版年鑑》(中國出版公司)。

2. 臺灣史碩士論文佔全部歷史學碩士論文的百分比：作者自行整理中央圖書館的資料(—：表示該年沒有歷史學碩士論文)。

3. 「臺灣研究」：臺北南天圖書公司，《臺灣研究總書目》(2000)。

引用書目

八千里路雲和月雜誌社

1992 《八千里路雲和月百集風華錄》(上集)。臺北：八千里路雲和月雜誌社。

于理

1987/04 〈諸神交戰的土地——臺灣史：文化霸權的競逐場〉，《南方》6: 14-17。

中國論壇社

1987 〈「中國結」與「臺灣結」研討會論文專輯〉，《中國論壇》，第25卷第一期(289期)。

王仲孚、王曉波(主編)

1997 《「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資料》。臺北：臺灣史研究會出版。

王甫昌

1996 〈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1: 129-210。

1998 〈臺灣族群政治的形成及其表現：一九九四年臺北市長選舉結果之分析〉，收於殷海光基金會主編，《民主、轉型？臺灣現象》，頁143-232。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王育德

1980 《臺灣》。東京：弘文堂。

王振寰

1989 〈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1): 71-116。

方豪

1976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收於《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頁1-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石計生等

1993 《意識形態與臺灣教科書》。臺北：前衛出版社。

江迅

1987 〈照朕的形象——國小教科書的意識形態〉，《南方》7: 25-31。

李天鐸

1997 《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中國電影史料研究會。

李金銓

1987 〈電視文化何處去？——處在中國結與臺灣結的夾縫中〉，《中國論壇》，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89期): 148-158。

李筱峰

1988 《臺灣民主運動40年》，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1991 〈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史聯雜誌》19: 105-119。

1998 《解讀二二八》。臺北：玉山社。

呂實強

1996 〈國中新課程「認識臺灣」(歷史篇)科設立的經過與教材教學有關的幾項問題〉，《國立編輯館通訊》9(2): 17-24。

杜正勝

1998 〈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歷史教科書風波的分析〉，收於杜正勝，《臺灣心·臺灣魂》，頁149-161。高雄：河神出版社。

吳乃德

1993 〈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於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27-51。臺北：業強出版社。

吳文星

1987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臺灣風物》37(1)：37(4)。

吳明時

1998 〈邊緣臺獨的「構框」與運動參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吳密察

1994 〈社會科——歷史〉，收於吳密察、江文瑜主編，《體檢國小教科書》，頁91-142。臺北：前衛出版社。

吳健民

1983/06 〈請勿認賊作父〉，《夏潮論壇》1(5)：66。

林玉體

1987 《臺灣教育面貌40年》。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周明德

1997 〈讓學術的回歸學術——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內容是否妥當公聽會〉，《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文件》，頁145-158。臺北：臺灣史研究會。

施敏輝

1990 《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高伊哥

1983 〈後藤新平——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生根》8：44-49。

高朗

1993 《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4 《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72-1992）》。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曹永和

1963 〈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北文獻》3：1-51。

許雪姬

1990 〈國民小學鄉土教材之檢討——以四年級社會第七冊為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1)：120-129。

1991 〈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史聯雜誌》19：89-103。

張炎憲

1988 〈當前臺灣史教育問題〉，收於《臺灣當前問題討論會專刊》。臺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黃仁

1994 《電影與政治宣傳》。臺北：萬象圖書公司。

黃光國

1987 〈「臺灣結」與「中國結」：對抗與出路〉，《中國論壇》，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89期）：1-19。

黃秀政

1996 〈國民中學「認識臺灣」（歷史篇）科的課程研訂與教材編寫〉，《國立編譯館通訊》9(2)：11-16。

黃俊傑

1999 〈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收於夏潮基金會主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廈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2。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黃國昌

1992 《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郭廷以

1954 《臺灣史事概說》（重排版：1996年）。臺北：正中書局。

楊雲萍

1990(1948) 〈臺灣的研究〉，收於楊雲萍，《臺灣的文化與文獻》，頁25-27。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楊聰榮

1992 〈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臺灣的中國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秀琪、陳慧敏

1998 〈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收於翁秀琪、蔡篤堅、陳順孝等，《新聞報導如何再現事實？語言層面的探討——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衛 民

1991 《中華民國的雙邊外交：功能主義外交的檢討》。臺北市：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夏潮基金會(編)

1999 《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廈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夏潮論壇

1983 〈〈編者按〉刊於陳逢源著〈後藤新平的殖民政策〉一文之前〉，《夏潮論壇》1(5): 65。
臺灣歷史學會

1995 〈「建立臺灣主體性歷史觀」座談會〉，《臺灣歷史學會通訊》1: 3-37。
盧建榮

1999 《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歐素瑛

2000 〈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與實踐——以《臺灣史事概說》一書為例〉，《臺北文獻》直字 134: 61-87。

龍應台

1987 《野火集外集》。臺北：圓神出版社。

劍 南

1987/04 〈官方說法的迷思——從部定歷史教科書談臺灣史意識〉，《南方》6: 8-13。

褚亞平

1997 〈《認識臺灣》意欲為何？〉，《人民日報》，「海峽論壇」，1997年11月11日。

戴國輝

1984 〈研究臺灣史經驗談〉，《夏潮》1984(3): 29-35。

戴寶村

1988 〈國民小學社會科臺灣史教材之檢討〉，《臺灣風物》38(2): 33-49。

1993 〈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收於《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集》，頁 115-138。臺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劉曉芬

1991 〈我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臺灣史教材的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Durham, William H.

1989 "Conflict,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A Summary." In Nancie L. Gonzalez and Carolyn S. McCommon, eds., *Conflict, Mig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Ethnicity*, pp. 138-14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Gonzalez, Nancie L.

1991 "Conflict, Mig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Ethnicity: Introduction." In Nancie L. Gonzalez and Carolyn S. McCommon, eds., *Conflict, Mig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Ethnicity*, pp. 1-1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Halbeisen, Hermann

1989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T'ai-wan I Shih): Facets of a Continuing Debate." In E. K. Y. Chen, Jack F. Williams, and Joseph Wong, eds., *Taiwan: Economy, Society, and History*, pp.

235-250.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 Samuel, P. 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siao, Frank T. S. (蕭聖鐵),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197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43." *Pacific Affairs*, 52(3): 446-467.

Huang, Teh-fu (黃德福)

1996 "Elec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Kuomintang."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pp. 105-136. Armonk: M. E. Sharpe.

Hughes, Christopher

1997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Newman, Saul

1991 "Does Modernization Breed Ethnic Political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43(3): 451-478.

Smith, Anthony D.

1971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4 "Ethnic Identity and Myths of Ethnic Descent."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7: 95-130.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National Imagination,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Content and Context Analyses of the “Getting to Know Taiwan” Textbook Disputes

Fu-chang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play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and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s surrounding junior high school textbooks entitled “Getting to Know Taiwan” in 1997.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disputes over the textbooks were a result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visions competing for access to textbooks as a symbol of official recognition. The timing and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s can only be explained in the context of a long-term struggle between the camp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and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over the past five decades. The two sets of competing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Taiwan diverge in their vision of Taiwan’s future (to unify with Mainland China or have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aiwan’s past (especially Taiwan’s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he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paper explains how the three major focuses of disputes were brought together along the long struggle between national imaginations and their immediate contexts in 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the 1990s. However, as the selec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vision of the future, complex historical facts were compressed into simple symbols and positions to justify visions of the future, which makes the dispute over history difficult to settle. Furthermore, the ethnic basis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embedded in the disputes ove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has reshaped and reinforced the existing ethnic consciousness.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what motivates most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disputes in particular and ethnic disputes in general is the worry about others’ disrespect or even erasure of one’s ethnic culture and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is considered a sign of ethnic demise.

Keywords: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Chinese consciousness, history, textbook, national imagination, ethnic consciousness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